

【研究論著】 General Article

DOI:10.6163/TJEAS.202406\_21(1).0004

## 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福清赴日移民的離返經驗與 非正式經濟

The Diaspora/Return Experience and the  
Informal Economy of Fuqing Immigrants to  
Japan during China' Reform and Opening-up

陳琮淵

Chen, Tsung-Yuan\*

張芷君

Zhang, Zhi-Jun\*\*

**關鍵詞：**福清移民、社會資本、非正式經濟、離返經驗、中日關係

**Keywords:** Fuqing migration, social capital, informal economy, diaspora/return  
experience, China-Japan Relations

---

\*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兼東南亞史研究室主持人。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Head, Research Office of Southeast Asia  
History, Tamkang University.

\*\* 淡江大學東南亞史研究室研究助理。

Research Assistant, Research Office of Southeast Asia History, Tamkang University.

## 摘要

改革開放後，大量中國新移民赴日發展，福清社群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社群之一。然而，不少在日福清人未具合法居留身份，經濟活動遊走於灰色地帶引發爭議，其生存狀態及發展策略值得探討。本文從跨國主義的視角出發，結合訪談及社會學理論，探索中國赴日移民的離散經驗及非正式經濟。我們首先梳理福清赴日移民的歷史和政策背景，其次透過十四位受訪者的口述資料描繪在日中國新移民的各種離返經驗，從而進行理論分析。

共同的離返經驗所形成的社會網絡是移民創業的重要資源，但是既有的研究多集中於跨境治理及僑鄉發展等，對於移民創業的分析流於表面，也很少處理非正式經濟等敏感議題。上世紀末中日經濟發展的巨大落差、以及非正式經濟的鉅額創收的背景下，福清移民不計代價積累資本，對中日移民發展及跨國治理造成不利影響。本文由深度訪談獲得大量一手資料，指出移民的社會網絡既能載舟也能覆舟，初期雖有助於移民在日生存創業，但福清社群緊密的人際網絡及獲利至上的發展意志，卻也成為跨國金融犯罪的溫床。

## Abstract

During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went to Japan for survival, and the Fuqing community i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mong them. However, many Fuqing people "going abroad" to Japan lack legal residency status, some of them engaging in informal economy, leading to controversy.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re worthy of discu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nationalism, this paper combining interviews and sociological theories, to explore their diaspora experiences and informal economy of Chinese immigrants to Japan. First, we outline the historical and policy background of Fuqing new immigrants to Japan. Second, through oral narratives from 14 interviewees, depict various experiences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Japan, thereby conduct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social networks formed through shared diaspora/return experiences are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However, most existing literature focused on cross border governance and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development, providing superficial analyses of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and often neglecting sensitive issues like the informal econom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significant economic dispariti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t the end of the 20 century and the substantial profits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Fuqing immigrants accumulated capital at any cost, which adversely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immigrant's community and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Based on amounts of in-depth interviews, we point out that immigrant social networks can both facilitate and hinder success. Although it helps immigrants survive and start businesses in Japan in the early stage, the close network and the profit-driven development mindset have also served as a breeding ground for transnational financial crimes.

## 壹、研究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後，京滬及福建居民大量赴日發展，其中又以福清社群最具代表性。起初，福清人透過各種合法/非法管道前往日本打工，創造大量匯款的同時也遊走於灰色地帶，屢屢挑戰中日兩國政府的邊境控管及社會治理，<sup>1</sup>福清人較早赴日發展，在中國新移民當中，其資本的積累及流通方式既有普遍性，也有獨特性，他們離返於中日之間的生存狀態及發展策略值得探討。<sup>2</sup>

誠如周敏所言：「中國新移民在不同移入地的人口構成、社區組織和融入模式呈高度多元化。...中國新移民不但來自不同的省份，移居到不同的國家，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迥異，移民方式、就業和創業模式也不盡相同，各國和各地區的移民社群形成、社區組織發展、經濟活動和社會融入等方面也截然不同。」<sup>3</sup>然而受限於資料、國家形象等考量，過去對特定移民群體非正式經濟的研究往往流於表面。

赴日發展的福清中國新移民的特色是年紀輕、頭腦聰明、適應力強；發展軌跡多由艱苦打工、自我剝削積累經驗及資本，進而投入各行各業；部分福清人更不惜鋌而走險，援引移民網絡資源從事賭博性電玩、地下匯兌，與中日黑幫勢力及跨國犯罪牽扯不清，也是該群體負面形象的主要來源。

必須指出的是，並非所有赴日福清人皆以非正式經濟維生，其他中國新移民社群也有參與，不同時期、族裔、國家移民中亦會出現類似情況。遠者不論，千禧年之初，因地緣鄰近及勇悍尚義，東北人成為在日中國新

---

<sup>1</sup> 據報導，中國公民占日本外國犯罪率總數 35%，比例及排名皆居首位。中國黑社會組織、結構及運作模式隨著中國新移民進入日本，在日華人幫派的崛起雖源於移民生存自衛需求，卻也因爭搶地盤引發衝突；而非法移民存在的事實，也導致地下經濟與犯罪活動猖獗。新華網，〈海外華人黑幫真已牛遍全球？媒體缺乏瞭解捕風捉影〉，《中國新聞網》，2010年8月16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hr/2010/08-16/2468933.shtml>，取用日期：2023年7月1日。

<sup>2</sup> 福清出國務工人員比例最高的蘆華村曾被中國公安部門列為「非法移民村」，該村 2000年代初曾被處以停辦護照三年的處罰。據知情人士表示，蘆華村每年的僑匯收入在人民幣十億元以上，村中八成以上家庭建起了洋樓別墅，也因此在此「出國賺一年等於國內五到十年」的強大誘因下，非法移民及地下匯款活動屢禁不止。楊興雲，〈福清樣本：兩輪移民潮的典型烙印〉，《經濟觀察網》，2007年8月9日，<https://www.eeo.com.cn/2007/0809/79353.shtml>，取用日期，2023年6月25日。

<sup>3</sup> 周敏主編：《長為異鄉客？—當代華人新移民》，（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21年）頁 xvii。

移民犯罪及地下經濟領域快速崛起的群體，<sup>4</sup>甚至成為電影《新宿事件》的故事原型，頗有後來居上之勢，但影響範圍主要集中在日本。相較之下，中國新移民涉入的非正式經濟中，福清人最受矚目的是既影響日本、美國社會的治安，也干擾了中國的金融秩序，形成跨國治理的難題。對此，媒體報導及法院判決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呈現。<sup>5</sup>

本文從跨國主義的視角出發，結合訪談研究及社會學理論，探索中國赴日移民的離散（Diaspora）經驗及生存樣態。<sup>6</sup>本研究首先梳理福清赴日移民的歷史和政策背景，其次透過十四位受訪者的口述資料描繪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福清新移民的離返經驗及生存策略，從而由跨國移民社會/創業資本理論分析不同階段的社會資本變化對赴日福清人經濟活動產生那些影響？

## 一、改革開放後的福清人赴日浪潮

社會學家薩森認為，移民從來都不只是個人選擇/行動，若非經濟過程與地緣政治開啟了移出國與移入國之間的遷徙管道，否則移民無從產生。<sup>7</sup>除了國境管制之外，全球經濟景氣的變化也是影響移民流向的關鍵。二戰後歐美的經濟榮景，拉美移民前撲後繼地越境追尋「美國夢」；一九七〇

<sup>4</sup> 高偉濃等著：《國際移民環境下的中國新移民》，（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3年），頁266-267。

<sup>5</sup> 福清人鄭某經營的地下錢莊號稱「福州地下中央銀行」，不但決定著福州地區每天的外匯黑市牌價，同時能夠承接小錢莊消化不了的大單，形成了一個嚴密的地下金融網路。據媒體披露的判決內容，2003年7月，鄭某與在日本的陳某合作，由後者在日本收集福清籍打工人員的匯款，將匯款人、收款人的有關資料傳真給鄭某。鄭某負責在國內收購日幣，再由同夥按傳真件逐戶送款，從中賺取手續費。當年8月21日至25日，陳某指定送款計8,057萬元日幣，已送達7,494萬元日幣。七八月間，鄭某向福清市兩家房地產公司出售港幣800多萬元。8月21日，鄭某將2,697萬元日幣交給張梅，由張帶到香港兌換成港幣帶回，從中牟利。福清法院因而認定鄭某等人在國家指定的外匯交易場所以外長期進行外匯買賣活動，擾亂金融市場和國家外匯管理秩序、情節嚴重，其行為構成非法經營罪。陳鴻星、邵東、張步忠，〈福清判罰一特大「地下錢莊」11人被判刑罰金〉，《中國新聞網》，2004年5月15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news/2004year/2004-05-15/26/436776.shtml>，取用日期，2023年7月14日。

<sup>6</sup> 沃托維克主張社會形式的離散包含三種面向：第一，它由特定的社會關係所組成，關係到共同的起源和遷徙路線；第二，在對家鄉的忠誠和對接納國的忠誠之間，存在一種政治傾向的緊張關係；第三，存在一些特殊的經濟策略，這些策略以動員集體資源的方式標示了特定的離散族群。Steven Vertovec, Three Meanings of "Diaspora," Exemplified among South Asian Religions.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Vol. 6, No.3 (Winter, 1997), pp. 277-299.

<sup>7</sup> Saskia Sassen, *Guests and Aliens* (New York: New Press, 2000), pp. 2-3.

年代兩度爆發石油危機，中東乃是全球最熱門的遷徙目的地。<sup>8</sup>一九八〇、九〇年代，在「經濟奇蹟」的召喚下，東南亞移工成為東亞四小龍基礎建設及照護勞力補充。<sup>9</sup>東歐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大量湧入高薪低生育率的歐美國家，推進了第三波人口轉型。<sup>10</sup>中國新移民大量赴日發展，同樣發生在政經鉅變、跨國企業崛起的後冷戰年代。<sup>11</sup>

一九八〇年代後期，中日社會經濟差距顯著、日本放寬移民政策等涵蓋了供需兩側因素的耦合，乃是福清新移民赴日發展的重要結構背景。

中國改革開放後，城鄉差異日益擴大，土地資有限和農業生產力低下，大量農村勞動力湧向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省市，<sup>12</sup>在大城市發展或出國打工，成為新一代農民重要的生計選擇。<sup>13</sup>有研究指出，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五年間，福建有超過五十萬人偷渡到國外打工，並將大部分所得匯回老家，不僅降低了失業率，更改變了華南農村的地景及生活方式。<sup>14</sup>富有冒險精神的福清人則積極向日本「淘金」。改革開放到千禧年間，福清人赴外發展至少歷經了兩代人，吃苦耐勞，敢闖敢拼，不少人辛勤奮鬥融入當地社會，亦不乏頻繁往返各國或衣錦返鄉者。<sup>15</sup>據統計，一九九七年六月，福清華僑華人總人數為五萬一千三百六十四人，較一九八〇年增加了二萬四千七百八十九人，他們居住在日本，新加坡、澳洲、美國等七十三個國家，其中又以日本最多。<sup>16</sup>

<sup>8</sup> 張晉芬：《勞動社會學（第三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2023年），頁400。

<sup>9</sup> 林季平：〈台灣的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問題回顧：1980-2000〉，《台灣社會學刊》第34期（2005年6月），頁175-177。

<sup>10</sup> David Coleman, Immigration and Ethnic Change in Low-Fertility Countries: A Thir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2, No. 3 (September 2006), pp401-446.

<sup>11</sup> 感謝匿名審查人提醒補充國際遷徙脈絡及相關理論討論。

<sup>12</sup> 蔡昉：〈中國轉軌時期的勞動力流動〉，收錄於羅紅波主編，《移民與全球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頁135。

<sup>13</sup> 林志斌、張立新：《打工者參與式行動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16。

<sup>14</sup> Mette Thunø and Frank N. Pieke, Institutionalizing Recent Rural Emigration from China to Europe: New Transnational Villages in Fuji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9, No. 2 (Summer, 2005), pp. 485-514.

<sup>15</sup> 福清市志編纂委員會：《福清市志》，（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年）。

<sup>16</sup> 中共福清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福清華僑史》，（福州：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頁14。

## 二、福清人赴日發展的類型與政策背景

改革開放後，中日敵對意識淡化、人員交流往來日益頻繁，<sup>17</sup>一九八〇年代後期以來，中國在日居留人數持續增加，且高度集中在東京地區。<sup>18</sup>福清人赴日發展主要包括出國留學、勞務輸出、商貿投資及非法遷徙四種管道：<sup>19</sup>

第一類是出國留學，赴日學習語言、技術或取得學位，然學成未歸者眾。

第二類是親屬團聚，以依親、伴讀為由申請，但多半是低技術勞務輸出。

第三類是商貿投資，包括投資移民、駐外商務人員等，比例低、人數少。

第四類是非法遷徙，指以偷渡赴日、逾期滯留等方式在日本非法居留者。

當中規模最大也最重要的是第一類，當時中國人赴日多以自費留學或進修語言、技術等名義申請，日本政府自一九八九年起屢次修訂《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等法律，以各種幌子從事非正式經濟活動者仍難禁絕。<sup>20</sup>前三類人當中，不乏基於各種原因往返於中日之間，甚至轉變成第四類，這也是本文著重分析的現象。

日本是福清人海外發展的主要目的地之一，移民成長的速度較快，現有總數約十萬人。與赴其他國家發展的中國新移民相似，福清人赴日發展既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副產品，也是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等力量在中國擴展的結果，更是全球化進程下，中國人力資源融入世界市場的過程。<sup>21</sup>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發表擴大派遣留學生的講話，中國政府緊接著實施向先進國家大量派出留學生的計畫。一九八〇年代初，中國官方開始鼓勵自費出國留學，實際上仍有不少限制。直到一九八四年國務院頒布《關

<sup>17</sup> 何思慎：〈台灣之日本研究的困境與改善〉，《亞太研究論壇》，第 26 期（2004 年 12 月），頁 86。

<sup>18</sup> 〔日〕中川雅貴：〈外国人人口の分布と移動〉，收錄於小崎敏男、佐藤龍三郎編著，《移民・外国人と日本社会》，（東京：原書房，2019 年），頁 65-66。

<sup>19</sup> 王付兵：〈福州沿海地區新移民問題初探〉，《閩江學院學報》，第 37 卷第 3 期（2016 年 9 月），頁 7-19。

<sup>20</sup> 〔日〕加藤丈太郎：《日本の「非正規移民」：「不法性」はいかにつくられ、維持されるか》，（東京都：明石書店，2022 年），頁 37-52。

<sup>21</sup> 李明歡：〈群體效應、社會資本與跨國網路—歐華聯會的運作與功能〉，《社會學研究》，2002 年第 2 期（2002 年 6 月），頁 30。

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才真正放開自費出國留學。一九七八年至二〇〇八年底，中國約有一百四十萬人出國留學。<sup>22</sup>另一方面，一九八〇年代日本經濟騰飛興盛，在「日本第一」的風光之下，產業卻面臨嚴峻的缺工問題，要求開放海外勞動力（即單純非技術勞動力）的呼聲日高。然而，既使在此情況下，日本對外國移民也不是直接無條件的開放，而是依實際需求，在不同時期修訂各種相關制度進行調節。近年來，隨著低生育率及超高齡社會來臨，日本政府也陸續開放移民限制，試圖打破「非移民國家」的印象，中國更成為日本最大的移民來源國。<sup>23</sup>

打著提高國際化程度的口號，在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Nakasone Yasuhiro）指示下，日本政府於一九八三年設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留學生政策懇談會」，同年八月公佈了〈關於二十一世紀留學生政策的建議〉。「十萬留學生計畫」也應運而生。日本的外國留學生，按其在留資格分為「就學生」和「留學生」兩類。「就學」是指外國人在日本的高中、盲校、聾啞學校、護理學校的高中部、專修學校的高中部或一般課程部、各種學校，以及在設施、編制上與上述機構相當的教育機構內接受教育。「留學」是指擁有十二年正規學校學歷的外國人在日本的大學或者相當於大學的機構、專修學校或者實施大學預備教育的機構及高等專門學校內接受教育的活動。<sup>24</sup>

一般而言，就讀於語言學校的學生持就學簽證，稱為「就學生」；直接進入日本的大學和專門學校等機構學習的學生持留學簽證，稱為「留學生」。為配合「十萬留學生計畫」計劃的推動，相關政策也隨之做出相應調整。首先，日本內閣會議決定解除留學生打工的禁令，「關於留學生打工，在不影響學業的一定範圍內，不是每次打工都需要獲取資格外活動許可，即使是超出範圍，申請許可手續也將簡化。」另外，放寬其活動範圍「一週二十個小時（不包括星期日、節假日以及假期期間）以內，從事不違法、對公共秩序和社會風俗無害的工作。」<sup>25</sup>一九八四年十月起，更簡化就讀日語學校就學生的入境手續。此後，就學生一旦通過審查，便可取得法務省「事前審查修了證」以利簽證申請。<sup>26</sup>此政策一出，日本語言學校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日語學校的經營者或經紀人中，出現了以入學費或學

<sup>22</sup> 鄭樂靜：《溫州人在日本：溫籍華人華僑口述歷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121。

<sup>23</sup> 邵春芬：〈日本的中國新移民〉，收錄於周敏主編，《長為異鄉客？—當代華人新移民》，（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21年），頁69。

<sup>24</sup> 鄭樂靜：《溫州人在日本：溫籍華人華僑口述歷史》。

<sup>25</sup> 廖赤陽等：《跨越疆界：留學生與新華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頁30。

<sup>26</sup> 廖赤陽等：《跨越疆界：留學生與新華僑》，頁31。



費名義浮濫收費的現象，日語學校的亂象愈演愈烈，帶來了以留學之名行打工之實的外國人出現、留學生結束學業後非法滯留等一系列惡果。<sup>27</sup>而有「十萬留學生，十萬黑戶口」的說法流傳。

從上可知，以日本的寬鬆積極的留學政策為主要推手，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變化，中國掀起了一股日本留學熱（參見表一）。而本文的研究對象正是這股熱潮中的「弄潮兒」—福清人。

**【表一】中日留學生政策變化（一九七八至二〇〇〇）<sup>28</sup>**

	日本	中國
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四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召開「面向二十一世紀留學生計畫懇談會」（一九八三年三月）</li> <li>● 「十萬留學生計畫」開始（一九八三年十月）</li> <li>● 放開留學生打工限制、簡化日語學校學生入境手續（一九八四年）</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鄧小平「關於擴大派遣留學生」講話（一九七八年）</li> <li>● 放開自費留學出國限制（一九八四年）</li> </ul>
一九八五至二〇〇〇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制定「研究交流促進法」（一九八六年）</li> <li>● 修改《入管法》，留學生得以在日就職（一九九〇年）</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繼續擴大公派留學生出國規模（一九九〇年代）</li> <li>● 確立「支持回國、鼓勵留學，來去自由」的政策方針（一九九二年）</li> </ul>

## 貳、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本節整合遷徙研究、社會資本及非正式經濟等相關文獻，為個案分析提供理論解釋的基礎。

<sup>27</sup> [日] 陳於華：〈増大する新来中国人のコミュニティ〉，收錄於庄司博史編著：《多みんぞくニホン：在日外国人の暮らし》，（吹田：千里文化財団，2004年），頁87-89。

<sup>28</sup>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一、國際遷徙的經濟學解釋

國際遷徙類型多元，且涉及政策環境、個人決策、家庭生計、族裔網絡、適應與認同、移民匯款等諸多層面，既是近年來廣受矚目的社會議題，更是跨學科的研究領域。有鑑於遷徙決策及過程多樣複雜，遷徙的原因與後果亦高度關聯。早在上世紀末，Douglas Massey 及其移民研究團隊就曾提出建議，認為最好將遷徙理解為一個牽涉廣泛的過程，而非僅是基於比較利益的個人選擇。此外，不同的理論或研究方法各有所重且不易兼容，幾乎不存在以單一移民理論解釋所有移民現象的可能性。分析遷徙首先需要承認遷徙的多樣性，並將之區分成不同階段、層次進行因果或路徑依賴分析。<sup>29</sup>

全球化時代，交通和通訊日益發達，探親、偷渡、往返、匯款的成本大幅降低，也更為即時便利，跨國遷徙圖象已非簡單的推—拉法則足以概括，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皆發展出相應的次領域。<sup>30</sup>經濟學基於對勞動力及供需機制的關注，也從單一國家的就業與勞動市場，延伸到與國際移民議題。主張經濟學可以解釋婚姻、教育、犯罪等各種社會現象，被視為是「經濟學帝國主義」（economic imperialism）代表人物之一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Gary Becker）也留意到日本的非法移民現象，甚至主張各國政府應該出售移民的權利，在剔除恐怖分子、罪犯、重病者，以及可能造成醫療重擔者後，允許任何付得起錢的人遷入。<sup>31</sup>

貝克將遷徙活動設想成一個市場，認為政府應當找到一個合適的價格，使移民數額與有意遷徙者達到均衡的看法，體現了經濟學新古典學派的移民理論（neo-classical school of migration theory）的基本論點。

新古典經濟學堅信供需法則，勞動力市場就是勞動力流動（移民）的機制，國內移民與國際移民並無分析原理上的區別。移民如同市場上的商品可透過價格調整達到均衡。在宏觀層次，若兩國的工資率存在差異，國際遷徙就會發生。在微觀層次，較佳的收入預期是影響個人遷移決定的關

---

<sup>29</sup> Douglas S. Massey,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and J. Edward Taylo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9, No. 3 (September, 1993), pp. 431-466; Douglas S. Massey,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and J. Edward Taylor.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sup>30</sup> 盧倩儀：〈政治學與移民理論〉，《台灣政治學刊》第10卷第2期（2006年12月），頁209-261。

<sup>31</sup> Gary S. Becker and Diane Coyle 著，徐春華譯：《移民的挑戰——一個經濟學的視角》，（北京：新華書店，2017年），頁10-19。

鍵，語言學習、邊境管制、心理負擔等相當於投資的成本與風險。國際遷徙將有助於消除國與國之間的工資差異，均衡意味著移民的停止。基於類似的基本假定，「雙元勞動市場論」(dual labor market theory)或「勞動市場分割論」(split labor market theory)則認為國際遷徙主要源於存在兩種以上不同類型勞動市場的發達國家對外來勞動力的持續需求，移民能夠獲得的工作及薪資，基本上取決於其技能、資格及經驗等人力資本。<sup>32</sup>

現實生活中，遷徙很少是純粹經濟導向的個人行為，或僅被國家之間經濟發展及市場差異所決定。大部分的移民不會完全斷絕與祖國的關係，匯款回國更是影響家庭生計及後續移民的重要現象。同享理性人假設的新遷徙經濟學(new economic school of migration theory)主張，國際遷徙決策的主體是家庭而非個人，更多是為了降低福祉風險及心理上的相對剝奪感，而不僅是追求經濟收入最大化；由部分家庭成員出國賺錢匯款貼補家用，既是個人也是家庭生存發展的策略。<sup>33</sup>強調資本主義體系對移民過程的解釋，還包括依賴發展、世界體系、商品鏈、全球化等政治經濟學、經濟社會學理論，這些被歸類為遷徙研究的「決定論」途徑。<sup>3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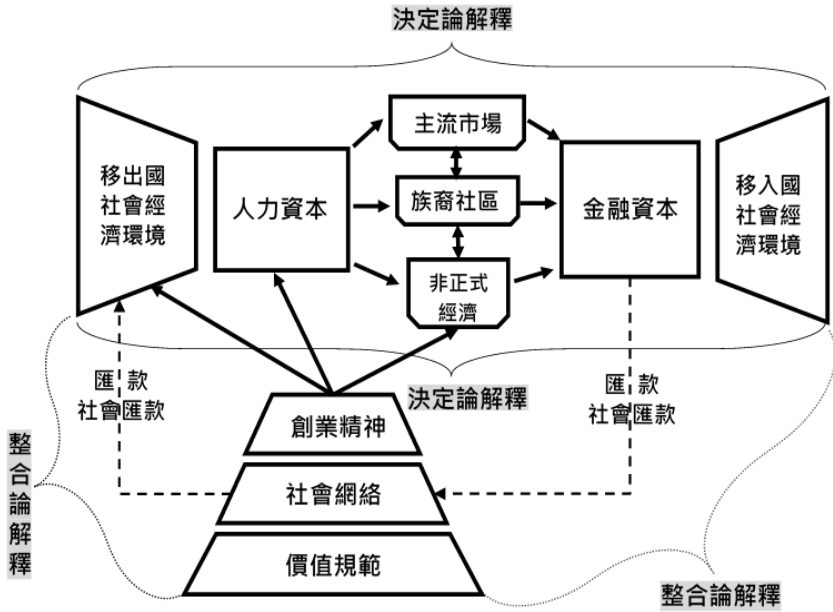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強調理論假設及模型分析的經濟學遷徙研究，多半不重視族裔資源、社會網絡及歷史脈絡等非市場因素，也較少討論移民的非正式經濟活動，就本文的研究對象而言，要進一步探討福清人赴日過程及網絡形成的具體形式和作用機制，有必要進一步援引社會學、人類學的族裔網絡、跨國主義、社會資本等「整合論」的分析思路(圖一)。

---

<sup>32</sup> Neil M. Coe, Philip F. Kelly, Henry W. C. Yeung. *Economic Geography: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13), pp. 171-205.

<sup>33</sup> Helga Leitn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In Eric Sheppard, Trevor J. Barnes. (eds). 2003. *A Companion to Economic Geography*.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Pp. 450-467.

<sup>34</sup> Michael Samers and Michael Collyer, 2017. *Migration*. 2nd London: Routledge. Pp. 54-160.



【圖一】 國際遷徙的過程及理論解釋<sup>35</sup>

## 二、移民的網絡與心理取向

觀察中國新移民活動的「連鎖效應」後，李明歡提出「僑鄉社會資本」的概念，她主張：僑鄉透過已定居移民、資訊網路和人情互惠提高移民操作的成功率和獲益率的能力，是一種社會資本，基本載體是僑鄉的跨國民間網路，運作機制是僑鄉群體以跨國遷移為依託的互惠原則，而與發達國家勞動力市場的有效連結則形成僑鄉社會資本不斷增殖的效益特性。<sup>36</sup>只有透過人力資本的輸出，社會資本才能轉化為經濟資本和政治資本等，在制度層面，移民如何將流轉的社會資本透過建立聲望及組織結社而壯大，也值得探討。

社會網絡不僅為跨國遷徙提供動機與保證，同時也是移民海外發展的重要資本來源。移民在國外開展生意時，社會網絡能為後來者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關係網絡和社會資本附著於個人生活底蘊當中，對個人創業表

<sup>35</sup>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sup>36</sup> 李明歡：〈「僑鄉社會資本」解讀：以當代福建跨境移民潮為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2005年6月），頁38-49。

現的影響並非由單一因素決定的，而是與移民政策、勞動市場等要素交織。<sup>37</sup>王春光的研究顯示，在海外打工溫州人都希望有一天自己能當老闆，也都努力去實現理想，能否如願，則有賴其他條件的配合。<sup>38</sup>

延伸此一思路，移民網絡的形態及內容絕非一成不變。<sup>39</sup>郭玉聰以福建移民為研究對象，探討移民網絡的形成與發展。福建的移民網絡是以家族和親緣關係為紐帶，最初的「一帶百，百帶千」牽引力隨著時代遞進而減弱，後來者亟需先行移民幫助的情況也發生變化。

陳國賁描繪了港商徘徊中港之間的創業故事和心路歷程。<sup>40</sup>他（她）們夾處於多重場域中，經歷著對家鄉情感依賴和在外創業決心的糾纏，身份認同和人際網絡也為他們帶來不同的影響。除此之外，陳國賁還研究新加坡華裔企業家，<sup>41</sup>觀察華商在跨國商業實踐中的個人操作與群體反應，探討移民過程、文化價值和企業家三者之間的內在關係。

對移民而言，文化價值同樣重要。移民以文化饋贈作為社會補償機制，此機制的動因、運作條件是什麼？周敏與黎相宜研究發現，移居國和祖籍地的社會經濟落差、僑鄉政府和民間社會對僑資的需求皆會影響移民的文化饋贈：首先，祖籍國與移居國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實力差距越大，移民在移居國的邊緣化程度越高，移民所面對的社會地位落差越大。第二，社會地位落差越大，移民在移居地的平均收入相對收入越高，進行社會地位補償的成本就越低，補償意願就更強，第三，僑鄉為移民所提供社會地位補償的供給越持續，其補償意願就更強。

### 三、移民的社會資本

自 Pierre Bourdieu 伊始，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學者援以進行分析也各有側重。當中尤以 Robert Putnam 對社會資本的定義

---

<sup>37</sup> Frida Boräng, *National Institutions -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Labour Markets, Welfare States and Immigration policy*.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Ltd, 2018).

<sup>38</sup> 王春光：〈流動中的社會網路：溫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動方式〉，《社會學研究》，2000年第3期（2000年9月），頁109-123。

<sup>39</sup> 郭玉聰：〈福建省國際移民的移民網路探析—兼評移民網路理論〉，《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2009年12月），頁113-120。

<sup>40</sup> 陳國賁，陳慧雲：《中港徘徊：香港流動巡迴企業家的故事》，（香港：中華書局，2007年）。

<sup>41</sup> 陳國賁，張其娥：《出路—新加坡華裔企業家的成長》王業龍（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頁2。

最被廣泛引用：「社會生活的特點（包括社會網絡、規範及信任），能使參與者更有效地一起行動，以追求共同的目標……簡而言之，社會資本就是指社會聯結以及伴隨而生的規範及信任。」<sup>42</sup>他將社會資本引入社區研究，把社會資本看作是一種「社區精神」，並進一步區分為「綁定性」（bonding）和「橋接性」（bridging）社會資本。Roland Burt 將社會資本視作非冗餘網絡結構為網絡中的行動者提供資訊和資源控制的程度，也就是「朋友、同事以及更一般的熟人，透過它們獲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資本的機會。」<sup>43</sup>亦即從「結構洞」（structural hole）的角度，分析個人是如何對社會網絡的資源進行控制的。林南將社會資本視為一種社會資源，它促使社會組織能夠協調合作，提高了社會生產的效率，認為社會資本是「在具有期望回報的社會關係中進行投資。」

就移民社會資本而言，Portes and Sensenbrenner 從鑲嵌的角度，將移民的社會資本區分為價值攝入（value introjection）、互惠交換（reciprocity exchange）、綁定連結（bounded solidarity）及強制信任（enforceable trust）四種類型。<sup>44</sup> Alejandro Portes 進一步指出，作為族裔資源的組成部分，社會資本對個人及群體的意義不盡相同，其效應亦有正有反，難以預期，研究者應清楚地界定分析範疇，並就個人/群體的社會資本及其負面效應（黑暗面）多做探索。<sup>45</sup>

然如 Asis and Piper 所言，亞洲的移民研究大多都集中在合法的移工及婚姻移民，很少研究資料不易取得的難民及非法移民。也因此，「移民研究幾乎都只以來源國或目的國為對象，很少透跨國連結將兩者串連起來，使之成為一個互動的單元，更遑論罕有以整個區域為範圍的分析了。」（頁 430）<sup>46</sup>另一方面，除了移民私密領域的生命史個案資料不易取得，缺乏精確的界定、政府不重視相關調查、將之視為不光彩的象徵，也是移民非正式經濟研究難以進行的原因所在。<sup>47</sup>

<sup>42</sup> Putnam, Robert, Turning in, Tur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28, No.4 (1995), pp. 664-665.

<sup>43</sup> Burt Ronald,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sup>44</sup> Portes, A. and Sensenbrenner, J, "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 Notes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8, No.6 (1993), pp. 1320-1350.

<sup>45</sup> Portes, A, *Economic Sociology: A Systematic Inqui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42-45.

<sup>46</sup> Maruja M. B. Asis, Nicola Piper. Researching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in Asia.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9(3)(2008): pp. 423-444.

<sup>47</sup> Cling, Jean-Pierre, Lagrée, Stéphane, Razafindrakoto, Mireille and Roubaud, François, eds. *The Informal Econom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Routledge, 2015), pp. 1-2.

本文認為，移民的社會資本鑲嵌在跨國社會空間，流動在移民間多重交織的社會網絡，為移民的生存與發展提供重要資源。陳國賁認為族裔資源與特定的文化和群體特徵有關，這些特徵預先設定、鼓勵或有助於族群成員在主流社會中從事各種商業活動，這些族裔資源包括族群價值、家庭結構、社區聯繫、親屬關係、同族動員以及某程度上完整的制度。<sup>48</sup>族裔資源是在特定的機遇結構下發揮特殊的聯結作用，這種機遇結構便是市場條件、影響族裔關係和商業關係的文化規範與社會規範，以及政府的移民、稅收和族裔商業發展政策。簡言之，移民社會資本的分析必須結合動機、文化及環境等因素，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誠如陳琮淵所言，移民的社會資本附著於族裔網絡，又源自個人或群體關係的知識、資訊、善意、信任等，起到觸媒、連結、以有濟無（提供交換機會）等作用，有助於移民的生存發展、交易往來和經濟積累。<sup>49</sup>

#### 四、社會資本與跨國經濟活動

社會資本常用於移民就業及商業行為分析。個人和群體間的影響機制則是綁定性資本和橋接性資本的相互作用。「有些資本是內聚型的（inward looking）傾向於強化排他性認同與同質性團體。這種社會資本包括在單一族裔中彼此稱兄道弟的組織、本於特定教會的婦女讀書小組、時髦的鄉間俱樂部。另外有些網絡是外展型的（bridging social capital）包括美國民權運動、許多青年服務性社團、推動普世教派合一的組織……黏著性社會資本提供了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強力膠，而嫁接性社會資本提供了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除膠劑」<sup>50</sup>更精確的說，綁定性資本將個人和群體緊密地聯繫起來，而橋接性資本則將群體與群體串連橋接在一起。

社會資本與移民創業的議題也被跨國主義研究所發揚。實際上，在跨國主義的分析框架中，移民的跨國社會場域往往由家族、商業和社團所構成。首先，國族與家族關係是商業和社團跨國社會聯繫的基礎。在移民走向海外發展的同時，家族關係也在不斷地延伸和重構。其次，家族網絡及資本也被用來發展各種跨國商業和服務業，且以上兩者間往往持續相互強

<sup>48</sup> 陳國賁：《華商：族裔資源與商業謀略》，（香港：中華書局，2010年），頁17-37。

<sup>49</sup> 陳琮淵：〈海外福州人的社會資本與創業發展—馬來西亞個案探析〉，《閩江學院學報》，第37卷第3期（2016年9月），頁20-26。

<sup>50</sup> 轉引自 David Halpern：《社會資本》黃克先、黃惠茹（譯），（臺北：巨流，2008年），頁18。

化。<sup>51</sup>

國際移民研究將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相結合，研究者不僅重視社會資本的作用，而且重視社會資本如何與金融資本、人力資本產生連結，以及在互動過程中發生的關係和結果。周敏和林閩鋼在研究美國華人社區時發現，族裔資本其實是金融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互動過程的產物。<sup>52</sup>他們指出，在傳統唐人街，早年移民主要是來自中國廣東的農民。作為勞工移民的他們缺乏人力資本，既沒有本錢創業，賺到錢多半也只是匯款回國養家，金融資本也較為匱乏。正因如此他們只能依賴同族社會資本找到基層工作，並且由於歧視及人生地不熟等外部壓力，他們必須團結起來，形成經濟社會學所稱的有限團結。<sup>53</sup>在這一時期，社會資本是積累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基礎。相較之下，處於轉型中的晚近華人移民社區則是多族裔混居的，赴美新移民通常有著豐厚的金融資本、較高的文化水準及專業技能，社會資本則可視為移民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共同作用的後果。簡言之，在不同的時期，三種資本發揮著不同的效用，具有不同的相互作用力（表二）。

**【表二】 不同時期三種類型資本之間的關係<sup>54</sup>**

傳統移民			新移民		
資本類型	強弱表現	關係	資本類型	強弱表現	關係
社會資本	+	基礎	社會資本	-	結果
人力資本	-	結果	人力資本	+	基礎
金融資本	-	結果	金融資本	+	基礎

移民個人的資本組合轉變也經歷著同樣的過程。初來乍到，一無所有時必須仰賴同族的幫助，也就是援引強關係的資源。一旦工作經驗增加，社會閱歷變多，事業穩定，積累了一定的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後，便較少

<sup>51</sup> Nina Glick Schiller, Linda Basch, Cristina Blanc-Szanton, Transnationalism: A New Analytic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Migration.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645, No.1 (July 1992), pp. 1-24.

<sup>52</sup> 周敏、林閩鋼：〈族裔資本與美國華人移民社區的轉型〉，《社會學研究》，2004年第3期（2004年9月），頁36-46。

<sup>53</sup> Mark Granovetter and Richard Swedberg（編）：《經濟生活中的社會學》瞿鐵鵬、姜志輝（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120-140。

<sup>54</sup>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周敏、林閩鋼，2004:36-46整理。



與同鄉聯繫，而是面向其他族裔、社區以外發展更廣泛的弱關係，而這種關係的建立也更多是以個人利益而非族群情感為前提的。

在社會資本與創業精神的框架之中，社會資本的綁定性和橋接性從是縱向探討個體和群體間如何相互影響的作用機制，而資本組合的關係轉變則解釋了橫向的個人底蘊是如何影響甚至決定了個人的創業表現。

## 五、福清新移民的研究

本文從四個面向對既有的福清新移民研究進行總結：

（一）福清赴日潮分析：王付兵研究一九九〇年代以來，福州沿海地區新移民的遷徙特徵，探討人口流動現象與職業分佈，及其所帶來的社會經濟影響。<sup>55</sup>何燕的碩士論文主要關注福清僑鄉社會轉型及僑匯的影響，對於新移民在日發展情況較為簡略，主要是訪談資料的呈現。<sup>56</sup>更重要的是，兩者皆僅停留在表面現象的描述，未進一步深入。相較之下，郭玉聰和莊國土對福州新移民赴日增長態勢的解讀就更為深入。<sup>57</sup>他們認為「因果積累說」以及「移民網絡說」能解釋為何出現大量新移民，而移民網絡是否能繼續擴大發展，主要取決於移入國的生存及發展空間，例如後期赴日打工收入萎縮，赴日人數便明顯減少。這篇文章描繪了福州新移民現象的圖景，但更細緻的理論分析則仍待展開。施雪琴在〈改革開放以來福清僑鄉新移民—兼談非法移民問題〉一文著重闡述僑鄉社會環境對非法移民出洋的推動力。<sup>58</sup>她認為僑鄉人民追求經濟利益、當地移民海外的歷史與傳統、福清人的群體性格是推動福清出國潮的重要原因，唯她對福清人的非正式經濟現象只是一筆帶過。

（二）移民就業與創業：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劉雙（Gracia Liu-Farrer）指出社會資本是一把雙刃劍，既為移民在日本的生存提供條件，也限制了他們在移居國向上流動的機會。這是因為在封閉緊密的移民社交網絡中，就業創業資訊管道單一且不對稱；在日非法滯留在移民社區司空見慣，也使得福建移民更容易背棄合法的身份。同時，福建移民的高負債率及教育

<sup>55</sup> 王付兵：〈福州沿海地區新移民問題初探〉，《閩江學院學報》，第37卷第3期（2016年9月），頁7-19。

<sup>56</sup> 何燕：〈改革開放以來福清籍旅日華僑華人與僑鄉社會研究〉（華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碩士論文，2018年）。

<sup>57</sup> 郭玉聰、莊國土：〈福州赴日新移民的增長態勢及其主要原因—以福清市為例〉，《南洋問題研究》，2008年第2期（2008年6月），頁52-62。

<sup>58</sup> 施雪琴：〈改革開放以來福清僑鄉的新移民—兼談非法移民問題〉，《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0年第4期（2000年12月），頁26-31。

程度偏低，背景差異造成其與日本社會中的老華僑及其他中國移民格格不入，只能團結在自己的圈子當中。<sup>59</sup>劉雙注意到社會/社交網絡對福建移民的影響，在一本專門探討中國赴日留學發展的重要著作中，她也指出福建移民深受群體及資訊封閉—老鄉網絡—的束縛，使他們不易跳脫非法居留及低薪工作等負面影響，<sup>60</sup>卻未進一步探究社會資本是如何將非法居留者引入地下經濟乃至於跨國金融犯罪的。對此，莊國土在其通史著作呈現福州長樂的美國新移民個案，分析新移民如何透過親緣、地緣關係順利偷渡、獲得工作機會及創業資金，此書雖非赴日福清人的專門研究，卻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sup>61</sup>

（三）移民匯款問題：僑匯一直是華人移民與僑鄉研究中的重要面向。《福清市志中》記載到：民國初年，僑匯有兩種管道：一是透過滙豐銀行，鄉僑在僑居地匯兌；二是透過民信局在僑居地匯兌，由民信局在各地分別解送。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民信局很快走向沒落，中國人民銀行主導著整個僑匯業務。<sup>62</sup>就當代的情況而言，沈燕清注意到福清新移民所經營的地下錢莊，<sup>63</sup>對福清人匯款回國現象和地下錢莊的運作進行初步的概括與解讀。但她並未進一步探討地下銀行出現的具體過程及背後的社會關係運作。事實上，地下匯兌在後期成為福清新移民非正式經濟活動的重要表徵及金融樞紐，反映了匯款對移民及僑鄉的重要性。

（四）僑鄉社會研究，特別是對僑捐文化的考察。孟慶梓從經濟和文化的角度考察海外移民對僑鄉社會的影響，探討大量僑匯對社會轉型的作用，以及傳統農業社會在改革開放時期的機遇與挑戰。<sup>64</sup>他的另一篇文章則從微觀的角度探討僑鄉社會文化的變遷，從農民生活方式的轉變、個人價值觀念的更新以及農村傳統倫理道德規範變化三個方面依次進行解讀，孟慶梓由此得到移民對僑鄉社會轉型的影響是利敵互見的結論。<sup>65</sup>此外，林心

<sup>59</sup> Gracia Liu-Farrer, *The Burden of Social Capital: Visa Overstaying among Fujian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 Vol. 11, No.2 (December, 2008), pp. 241-257.

<sup>60</sup> 劉雙：《從打工者到跨國人才：當代中國人赴日留學 30 年》，（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37-57。

<sup>61</sup> 莊國土：《世界華僑華人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273-277。

<sup>62</sup> 福清市志編纂委員會，1994，《福清市志》。

<sup>63</sup> 沈燕清：〈福清新移民與僑鄉地下錢莊關係探析〉，《八桂僑刊》，2012 年第 2 期（2012 年 6 月），頁 57-62。

<sup>64</sup> 孟慶梓：〈海外新移民與當代鄉村經濟變遷—以福建省福清市 J 村為個案的實證研究〉，《南方人口》，2007 年第 4 期（2007 年 12 月），頁 39-44。

<sup>65</sup> 孟慶梓：〈海外新移民與當代農村文化變遷—基於福建沿海 J 村的調查分析〉，《南方人口》，2008 年第 1 期（2008 年 3 月），頁 18-24。

滄則以福清為個案解讀僑鄉社會的僑捐文化背後的思想觀念和社會文化動因。<sup>66</sup>簡言之，僑鄉社會研究主要專注在供給側的僑民心理及僑鄉文化分析。

從以上文獻回顧可知，由社會學的理论視角分析福清人離返中日的經驗實屬必要，而現有文獻對福清移民的非正式經濟關注較少，也有待更為具象的研究。

## 六、研究方法

### (一)、口述歷史

本研究採用的口述歷史研究方法，是以錄音訪談的方式搜集口傳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sup>67</sup>口述史的珍貴即是在顛覆官方及學院的研究書寫傳統，有時可挑戰人們對歷史的傳統認識，或改變原本以男性為中心、只重視精英的觀點，開始從女性、底層及人民的角度出發看歷史。<sup>68</sup>本研究搜集當事人的親身經歷，得到具有豐富細節的移民奮鬥發展史，以及普通福清人在日打工者的生活圖景。這些訪談資料有著不可避免的「主觀」層面，它是私人的、非公開的和內部的。然而正是因為此一特質，我們需要用外部的、客觀的和公開的「東西」來有意識地、故意地平衡它。<sup>69</sup>社會學者米爾斯(C. Wright Mills)在《社會學的想像力》一書中指出：「唯有定位在自己的時代裡，個人方能瞭解自己的經驗，並衡測自己的命運；唯有瞭解周遭個人的機運，方能瞭解自己的人生機運。」換句話說，我們需要把個人的生活遭遇置放在時代的大框架中，才能夠明白事情的真正原因。

將主觀的口述歷史置放於時代的大框架中，正是我們所做的平衡。具體方法是透過田野調查收集詳細的個人檔案，觀察當年移民在今日僑鄉社會留下的痕跡。唯有在口述史的敘事中，我們才能發現社會的「變通性、過程性和模糊性」。<sup>70</sup>

### (二)、個案研究

限於資源及議題性質（涉及偷渡、偽證及地下錢莊）難以透過普查方

<sup>66</sup> 林心滄：〈改革開放以來華僑華人在福清僑鄉捐贈行為的文化解讀〉，《八桂僑刊》，2013年第4期（2013年12月），頁15-21。

<sup>67</sup> Donald A. Ritchie：《大家來做口述歷史》，王芝芝（譯）（臺北：遠流，1997年），頁34。

<sup>68</sup> 林福法：〈口述歷史的特性與作用〉，收錄於許雪姬主編，《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臺北：臺灣口述歷史學會，2014年），頁31。

<sup>69</sup> 陳國貴，張其斌：《出路—新加坡華裔企業家的成長》，頁390。

<sup>70</sup> 應星：〈略論敘事在中國社會研究中的運用及其限制〉，《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2006年9月），頁71-75。

式進行，本文採用滾雪球的方式進行個案挑選。我們首先透過田野地的親友尋找合適的訪談對象，完成最初幾個訪談後，再請研究對象介紹同樣有旅日經驗的友人或同鄉接受訪談，直到收集到的資料接近飽和為止。調查過程中，我們並未刻意挑選非正式經濟的參與者，而是盡可能地收集福清人旅日過程中方方面面的經驗及回憶，透過與既有文獻的比對及田野調查觀察來確認受訪者的陳述是否屬實，判斷其是否具有代表性且能涵蓋改革開放時期赴日發展的福清人的一般情況。當然，以滾雪球方式進行抽樣，必然存在同質性較高的侷限，同時受訪者所提供資料也相對集中在一九八〇年代末到二〇〇〇年初。本文在福清地區訪問十位有旅日經驗的當地人，此後再利用華僑大學召開「一帶一路」研討班的機會，採訪了四位曾在日本發展的福清籍學員，繕打逐字稿，由其確認後整理成生命史口述記錄（詳見附錄）。這正是多點民族誌<sup>71</sup>（Multi-Sited Ethnography）的方法，即在不只一個地方進行田野調查，不放棄任何一個可能接觸到的研究對象，全力搜集相關的資料。

本文嘗試在福清新移民個案中日離返的生活軌跡中，找尋出社會資本所發揮的經濟社會作用。在資料取得及研究方法層次，由於福清赴日移民非法活動引發關注，受訪者防禦心理普遍較高，一般研究者不易探得實情。然本文作者之一是出生在日本的福清移民後代，適可應用「闡釋性內容分析方法」，即研究者熟悉受訪者所敘述的生活、情感和經歷，得以就受訪者所吐露的可靠內容，進行準確的評估及闡釋。

## 參、赴日福清新移民的離返經驗

### 一、從「雞叫」到「鬼叫」

赴日福清人的艱辛，不僅是身體上的勞累，更是心中無法言說的不適和焦慮。一九八七年，福清新一批留學生抵達日本，他們背景不一，有著不一樣的教育水準，做著各行各業的工作，但都是抱著掙大錢的願景，踏上異國他鄉的土地。

S先生一九八八年第一次赴日時，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他落腳在大阪的語言學校。通常，這時期新移民在日本的第一站往往是語言學校。辦理簽證時是不允許自行選擇語言學校，都是「蛇頭」隨機的選擇。但是語言學校卻間接影響了非法移民在日本今後的生活圈，它不僅為赴日之初一無所有的福清人提供了一個落腳的地方，還是一個新移民互通有無，交流資

<sup>71</sup> 涂炯：〈多點民族志：全球化時代的人類學研究方法〉，《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12月2日。

訊的場所。學校翻譯能有償（抽成）提供工作，同學間也會相互幫忙介紹工作和便宜的住所。當時大阪福清人不多，S先生只能依靠自己艱難地展開異國生活。在那個尚不知泡沫經濟為何物的日本經濟黃金年代，工作機會俯拾皆是，「3K」<sup>72</sup>行業正缺乏人手，急需像S先生這樣的外國勞工。但是，S先生卻是持留學生簽證，以就學生的身份進入日本的。他還需要在學校裡學習。他就讀的學校管理嚴格，一整天都有排課，S先生只能夠白天上課學習，晚上上班掙錢。雖然工作生活兩頭燒，但S先生仍能利用上課的間隙，結交同樣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一位來自四川的人民大學畢業生同學就為S先生介紹了一份運輸公司的工作。S先生還透過肢體語言與募工的雇主交流，積極尋找工作。S先生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在運輸公司卸過貨，在零下二十七度的冷凍廠中搬貨，也有其他新移民在工地搬磚、在食品廠殺雞，這些都是屬於日本人不願從事的「三K」行業。二〇〇五年，日本法務省公佈了已逮捕的非法居留者所從事的活動內容。其中有四分之一是工廠工人；百分之十五曾經從事陪酒或類似工作，其中絕大多數是女性；還有以男性為主的百分之十五是建築工地的工人；其餘則包括了廚師、服務員、洗碗工，以及其他一些服務業的人員。這些非法居留者中有超過半數都已經在日本居住了五年以上。<sup>73</sup>

S先生語言學校畢業後，為了取得簽證選擇留下來念大專，專業是酒店管理。S先生並不是因為想要從事相關專業，而是資訊的閉塞讓酒店管理選擇了他。在在此期間，因為S先生仍是有正規身份的留學生，能夠偶爾回家。大專學校念了一年半，遇到日本政府簽證政府縮緊，S先生便選擇「黑了下來」。

那我黑下來打工是什麼打法？從星期天晚上十點開始上班，上到第二天早上八點，然後八點又開始上班，上到晚上五點，然後五點半又開始上班，上到早上八點。然後沒回去，然後到（下個）星期天早上八點下班，回去，然後晚上十點出來。一個星期中在宿舍的時間就只有，星期天早上八點多九點到宿舍，然後晚上九點出去，沒回來。睡覺（的話），上班的時候我當時是搬運工啊，行李分類，分完以後，到十點，拼命分，分到十二點多，一點然後開始睡，睡到兩點多三點，然後起來去幹活，一天就睡這幾個小時。<sup>74</sup>

<sup>72</sup> 「K 行業」也被稱為「3D 行業」，「3K」指日文裡的きつい(難受)、危い(危險)、汚ない(髒)，「3D」則是指英文裡的 difficult(困難)、dangerous(危險)、dirty(髒)。

<sup>73</sup> 劉雙：《從打工者到跨國人才：當代中國人赴日留學 30 年》，（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 年）。

<sup>74</sup> 引自 S 先生訪談記錄。訪談日期：2018 年 4 月 17 日。

有一天，S先生來到一家機械廠，他很喜歡這裡的工作，因為這裡有機械，有機床，有衝床。老闆說，一天工資一萬二千（日元），S先生說：「我只要九千，三天以後定工資。」三天之後，老闆將他的工資定在了一萬一千。一個月後，S先生的工資漲到了一天一萬三千。三個月後，再提高到一天一萬四千。還外加五萬的住房補貼，和四千的酒錢。從此之後，S先生的工作就穩定下來，幾乎很少換工作，也幾乎從來不休息。S先生認為：「日本人還是挺喜歡我們中國人的。我們中國人只要肯幹活，好好幹活，日本老闆就會賞識你。」無獨有偶，本研究訪談過程中，也有其他受訪者說過類似的話。「我幹活幹得好，後來工廠長都非常非常喜歡我，很聽我的話。」他們都認為，在日本，能受到比中國更加公正的待遇，因為日本是一個制度健全的國家，只要你好好幹活，你就能有出頭天。這樣的經歷也深深地影響了後來出國就業創業的福清人。

根據報導，當時在日本打工的福清人，一年平均能匯十五萬元人民幣回中國。一九九一年，福州長樂市僑匯收入是一千六百萬美元，一九九八年達到二億三千萬美元。如果加上經由地下錢莊的匯款，則超過五億美元，遠超過當時長樂市的財政收入。<sup>75</sup>

在日本全年無休地幹了六年之後，S先生攢下了將近一百萬元人民幣，他也覺得夠了，於是在一九九四年選擇回國。一九九五年福建城鎮居民的人均現金收入是五千四百八十六點五二元人民幣，<sup>76</sup>似乎照這樣看來，S先生攢下的一百萬一輩子都夠花了。但是僅僅過了四年，S先生便決定再次去日本打工。這是因為他蓋了大房子，很快耗盡積蓄。但他覺得這一切都值得，打工賺錢就是要買地，要蓋大房子，裝修還要夠氣派，這樣才能讓周圍的鄰居知道自己在日本是有所成就的（相片一及二）。

<sup>75</sup> 楊興雲，〈福清樣本：兩輪移民潮的典型烙印〉，《經濟觀察網》，2007年8月9日。

<sup>76</sup> 福建統計局：《福建統計年鑒（1999）》，（福州：福建統計局，1999年），網址：<http://tjj.fujian.gov.cn/tongjinnianjian/dz99/index1.htm>，取用日期2018年6月16日。



### 【相片一及二】福清赴日移民匯款回鄉興建的樓房<sup>77</sup>

錯落於福清鄉間豪華壯麗的「怪獸屋」說明了福清移民獨特的創業精神及移民文化，無怪於跨國犯罪的研究者有以下評論：

建築物愈怪異、城市愈富有。最能證明福建人冒險犯難精神的，還是在福清等大城周圍的農村聚落。福建農民不種稻、也不種茶，他們「種」房子。不是茅屋或小房，而是靠海外賺來的錢蓋五、六層樓高的新古典大樓房。舉目望去，福建鄉下有成千上百的樓房——絕大多數是只有一家人、住了一層樓，其餘的樓層就空置不用；還有不少房子根本就是空屋。這就是福建人發揮「面子」精神的極致。不管日子過得多苦，象徵成就的「面子」一定要爭到。…為了向外人展現面子，福建移民工拼命匯錢回鄉「種」房子。<sup>78</sup>

一九九八年，S先生花了二十幾萬人民幣，從蛇頭手中買了一張偽造的船員證，登上了駛向日本的航船。一九九〇年代末，日本收緊了對福建和上海的簽證，但是這並不能阻擋福清人前往日本淘金的腳步。人們用假護照、假船員證、假探親等手段，不惜代價赴日打工。但是當時的日本卻已進入經濟泡沫的後期，工作不再唾手可得。這完全難不倒故地重遊的S先生，他駕輕就熟地找到工作過的工廠，幸運地在原來的工廠上起了班。由於S先生工作經驗豐富，幹活賣力、全年無休，他甚至同時打兩份工。隨

<sup>77</sup> 資料來源：作者攝於田野調查，2018年4月24日。

<sup>78</sup> Misha, Glenly：《黑道無國界》林添貴（譯），（臺北：時報文化，2009年），頁395-396。

著工資漸漸調高，他決定留在日本專心在工廠打工。

在日本打工的 S 先生，幾乎不需要來自朋友或同鄉的幫助。因為他語言能力佳，能去尋找自己想要的工作。並且他也知道，在一個工廠待久了之後，隨著工作經驗的增加，工資也會提高，不像初來乍到時，要不停地換工作才能獲得比較高薪的工作。他也幾乎不聯繫同時期在日本朋友和親戚，一是打工實在太忙，二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工資比較高，很容易招致別人的嫉妒，自己又是黑戶口，害怕被人舉報。但是只要家裡人聯繫他，告訴他有親戚要來日本，需要他幫忙接應，他都能幫就幫。不僅幫助同鄉找到比較好的工作和合適的房子，當他們有困難主動來聯繫他的時候，他也會想辦法儘量幫忙。至於回報也就因人而異，有的人會知恩圖報，長年感恩在懷，也有不念恩情，很快便相忘於江湖。這在移民網絡之中是十分常見的，人們會把幫助後來者視為自己的責任，這也符合福建新移民親族式遷移的顯著特性，先行的移民很願意為後到親戚同鄉提供幫助。<sup>79</sup>然而，相較於在日本被「欺生」，有了一定基礎的福清人往往更擔心被自己人算計。「殺熟」在當時處於市場化經濟轉軌時期的中國已相當普遍，是一種熟人利用相互之間的信任，進行欺詐行為的現象，<sup>80</sup>在日福清移民社群同樣存在「殺熟」現象。

Q 女士對自己在日經歷的細膩講述提供了更加生動的畫面。Q 女士並不像 S 先生那樣幸運，她高中畢業，原是家庭主婦，在丈夫第二次赴日打工的一年後，她想夫婦一起可以多賺一點錢，於是留下家中的一雙兒女給妹妹照顧，遠赴日本打拼。

Q 女士到日本的時候是一九九八年，尚未從經濟危機當中恢復過來的日本，早已不似當年「遍地黃金」。與 S 先生不同，Q 女士既不會日語，也沒有專業技能，剛到日本的三個月，Q 女士找不到任何工作。語言既能粉碎了人類建造巴別塔的通天之夢，也能使得一個身在異國他鄉的打工者無工可做。當時在日福清人找工作主要有三種方式：找工作仲介、朋友介紹工作、自己看雜誌打電話應聘。找工作仲介的介紹費視月工資和工作時間長短而定，比如二十萬的工作就收五萬，十萬的工資就收二至三萬，<sup>81</sup>而朋友介紹的工作也隨機遇而定，如果能掌握基礎的日常日語，就有可能在勞動力市場上自力找到稱心的工作，不用仰賴他人。

<sup>79</sup> 郭玉聰：〈福建省國際移民的移民網路探析—兼評移民網路理論〉。

<sup>80</sup> 鄭也夫：〈走向殺熟之路—對一種反傳統歷史過程的社會學分析〉，《學術界》，2001年 第 1 期（2001 年 3 月），頁 58-76。

<sup>81</sup> 根據受訪者所述，當年的月工資為 20 萬元-60 萬日元不等。



當時 Q 女士的丈夫也在打工，認識的朋友有限，沒有門路找到那些專門介紹工作的人。在家中艱難地等待了三個月後，Q 女士在朋友的介紹下進入日本料理店打工，給廚師長當副手，負責配菜。晚上下了班，還跑去麻將館洗杯子。由於找不到其他工作，Q 女士只能應徵一些晚班工作，從晚上十點做到第二天凌晨五點。這樣的高強度工作，Q 女士堅持了十個月。

我現在還是會經常做夢夢見自己在日本的地鐵站趕最後的一班車，在地鐵站裡跑來跑去。當時有幾個月，我的朋友問我晚上要不要多做一個小時，她讓給我做，於是我每天晚上為了多上這一個小時的班，要在地鐵站內跑來跑去，趕最後一班地鐵。<sup>82</sup>

Q 女士和她的丈夫還有朋友們都在同一家日本料理店裡打工，「我的朋友雖然會教我一點日語，但是她不會真的全部教給你，就好像『教會徒弟，餓死師傅。』那樣。所以在日本那麼久，我就只會一些工作上的語言，其他的日常交流，我基本上都只能聽，不能講。」

就這樣 Q 女士一天打兩份工，甚至在過年的時候也沒有休息。有時候累了，想聽聽家中孩子的聲音，可是，等她有時間打電話了，孩子卻常常不能接到電話。

2001 年的某一天，Q 女士一如往常比丈夫早半個小時出門上班，但到了上班時間，卻不見丈夫來上班，她知道肯定是出事了。原來是在日本經營地下銀行的妹夫被抓，日本員警擔心涉及黑道，便一一搜查他去過的地方，由此牽連了一大班在日本打工的親戚們。丈夫被抓之後，Q 女士不敢回家，她們原本借住在朋友家，可是朋友也擔心受到牽連，她就只能去東京郊外的親戚家小住。無奈那裡的工資太低，Q 女士只好請親戚幫忙打電話給原來打工的店主，才又回到東京上班。Q 女士不敢回自己的原來的住處，於是便住到妹夫的一位朋友家，「說是住在他家，其實我是幫我妹夫討債，我妹夫還有一百多萬的錢在他那裡，他出事了之後，怕拿不回來。」

此後，Q 女士又在朋友的幫助下找到了其他工作，堅持了半年多，某天走路的時候，被摩托車撞倒，好心的日本人非要送她去醫院，結果到了醫院之後，Q 女士拿不出身份證，非法的身份曝光，她也被遣送回國。當時，滯留在日本的福清非法移民經常因為類似的意外被遣送回國，生病了也往往不敢去醫院求醫。

<sup>82</sup> 引自 Q 女士的訪談記錄。訪談時間：2018 年 4 月 24 日。

## 二、中日徘徊

日本曾是無數福清新移民夢寐以求的地方，可是來到之後才發現，日本根本不是「天堂」。福清人離開了熟悉的環境，來到陌生的國度謀生，語言不通，幾乎「又聾又瞎」。《闖蕩日本——一個福清人眼中的日本》書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叫凡平的人，他是帶著鐵鍋、大米、一條別人送的中華牌香煙和一身的債，滿腦子的理想踏上東瀛之路的。<sup>83</sup>

「在家千日好，出門萬般難。」福清的新移民群體大多都是青壯年，有的孩子尚在繡襪之中，有的尚未遠離父母的羽翼。想家，是每一個在日福清人都會遇到的問題。每逢佳節，他們都會默默垂淚，不僅僅是懷念家鄉的親人，也是懷念家鄉的舒適生活。「有時候，只是想打電話回家，聽聽孩子們的聲音。」電話費是在日福清人的一項重要的開支，人們幾乎每天都打電話回家，拉拉家常，或是詢問家中發生的大小事件，或是報告在日本生活的近況。當時，日本的街頭林立著大大小小的電話亭，當時的國際長途電話很貴，人們也不敢多說。福清人也會在休息的時候，買一些日本的衣服、玩具等東西寄回家。

於是，當時有一些人，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或是為了更快地掙到更多的錢，夫妻倆雙雙在外打工。而把孩子留在國內由親人撫育，成了「留守兒童」。但正是有了這種相互之間的需要，福清人群體的凝聚作用一直很強。

語言，承載不了想念的苦楚，他們大多數人隻身在外拼搏，無法享受到家的溫暖，然而他們選擇在外打拼，是為了讓家人享受到更好的生活。選擇「黑下來」的福清人，必然抱定破釜沉舟的決心，因為無證遷徙意味著選擇了一條「不歸路」，不知道何時才能再回到故鄉。他們的心中在想家與不想回家之間徘徊，因為回家就意味著失去了在日本掙錢的機會，不能榮歸故里才是他們最害怕的事情。

他們想著再努力一點，早點掙到足夠的錢，早日回到家中。可是，當時的福清人又怎麼會知道，隨著物價上漲，在日本打工的錢根本不夠花。S先生和D先生都是在日打工五、六年，積蓄了一百萬人民幣，可是回國蓋完房子就沒有錢了。S先生一九九四年回國後，曾經嘗試過在中國找工作，擔任日語翻譯兼接待，但是他覺得工資太低，而且週六還要加班不能陪伴家人，於是他又辭職了。S先生說，「剛回來的時候，覺得虧欠孩子太多，

---

<sup>83</sup> 毛立平：《闖蕩日本：一個福清人眼中的日本》，（福州：海潮攝影藝術，2002年），頁128。

所以孩子說什麼我都可以，他犯錯我也不說他，他想要什麼我就買給他。」由於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缺席了，導致他們回國後，出現了心理上的斷層，在他們心中，似乎孩子還是尚在襁褓中的嬰兒。

赴日的福清人會千方百計地取得在日合法身份，這樣他們便能夠在中國和日本之間來來回回，大多數是為了家人，也有的是為了事業的需要。其中，福清人最常使用的手段就是假結婚。也就是用錢收買日本人辦理結婚手續，一旦進入日本後就分道揚鑣了，只有簽證延期等特別情況才再見面。然而，由於假結婚現象氾濫，日本的入境管理局也學聰明了，他們會分開詢問夫婦關於家庭、房子以及鄰居的情況。答對了才能辦理手續。<sup>84</sup>Y女士透過假結婚取得日本國籍之後，二〇〇四年小兒子也回中國念書，丈夫在國內照顧孩子，她便一個月回國一次與家人團聚。訪談時，Y女士正盤算著讓兒子透過旅日僑胞的身份在國內上個好大學。事實上，Y女士和她的小兒子都有日本國籍，但是他們家卻沒有在日本發展的打算，今後還是會在中國發展。與此類似的，R先生的兩個孩子都在日本上大學，還有一個在家鄉念書的孩子，R先生也打算將他送到日本念書。

X先生在日本有了穩定的生活之後，一年之中也會常常回國看望家中的老母親。雖然為了彰顯自己的成就，在老家蓋了大房子，但是偌大的家中就只有X先生的老母親孤身一人。對於福清人來說，有了合法的身份，在中日之間來來去去便不是難事。甚至，他們也會利用中日之間的社會經濟狀況的落差，從事一些平行輸入的生意。

社會匯款（social remittance）是能指引起社會文化資本流動的移民跨國聯繫。<sup>85</sup>移民在客居國仍然與祖籍國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在這聯繫之中，含有文化意蘊的種種事物使得祖籍國的人產生文化想像，這便產生了文化資本的流動。如當時人們會從日本寄回一些衣物或是在日本遊玩的相片，在寄託思念的同時，也讓家鄉的親人與日本產生了深刻的連結，他們對日本社會產生了許多帶有自身印記的想像，日本對於中國的文化輸出就變得自然而然（相片三及四）。當時，日本的動漫正風靡全球，福清的孩子們更容易接觸到日本的動畫DVD以及電玩遊戲機。

<sup>84</sup> 毛立平：《闖蕩日本：一個福清人眼中的日本》，頁98。

<sup>85</sup> Peggy Levitt, Nina Glick Schiller, Conceptualizing Simultaneity: A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 Perspective on Socie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38, No.3(1992): 1002-1039.



【相片三及四】福清人在日本迪士尼遊玩<sup>86</sup>

在日打工的經歷帶給福清人更多的是生活習慣上的改變，他們不僅訝異於日本社會中那種人與人之間與人為善，日本健全的社會制度帶來的便利也讓他們稱羨。文明禮貌、待人接物、飲食習慣這些表面上的改變，最初是他們為了適應日本社會而進行的「再社會化」（resocialization）。回到中國之後，這些習慣或隨著日常生活的改變而漸漸消失，也有因為某種實質上的認可而被保留了下來。

我非常非常喜歡日本人，我覺得日本人很善良，對我們非常好。不管是路上的陌生人，還是隔壁的鄰居都會對你很好。我覺得日本人比中國人好太多了，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日本人。直到現在我還是很想去日本，前幾年，我又想辦簽證過去，結果簽證都批下來了，到了海關的時候，摠那個指紋被認出來了，不讓我過關，只能又回來了。<sup>87</sup>

日本社會深深地改變著福清新移民，在訪談過程中，那些在日本待了許多年的人舉手投足之間都有著日本風味，他們待人接物十分有禮貌，敬語不離口。然而，他們與家鄉始終保持著割捨不斷的聯繫。這種聯繫不論是情感上的，還是事業上的，都始終伴隨著他們。這也是讓他們在中日之間不斷徘徊生活的動力。但是這種聯繫也會隨著代際差異而漸漸減弱，如在日生活的 L 女士，她每年都會回國一至兩次，但是她的三個小孩，卻不經常回國，只會一些中文，然而父母並沒有教他們福清方言。這是否意味著福清對於他們而言只是一個陌生的家鄉呢？

<sup>86</sup> 資料來源：受訪者提供

<sup>87</sup> 引自 L 先生的訪談記錄。訪談日期：2018 年 4 月 24 日。

對於無法回國的無證移民來說，他們的跨國聯繫更是寄託在現今看來極為平凡且微不足道的生活事物當中，如家人寄來的衣物，相片甚至是日常電話，而對於那些已經在日本取得身份並擁有穩定的事業的新移民，他們的跨國聯繫則遠遠不限於此，他們或是為了事業發展，或是為了對父母盡孝，或是為了割捨不斷的鄉情而離返於中日之間，創造著獨屬於他們的跨國社會空間。

### 三、由灰變黑

H 先生與 S 先生是高中舊友，但是兩人在日本的經歷卻有著截然不同的面貌。H 先生喜歡交朋友，他的父親原是小學校長，離休時，他替補了他的父親，成為一名小學教師。但是他很快就辭職了，開始做起一些走私生意。聽朋友說，日本很好賺錢，他覺得自己又不少條胳膊，腦子也比別人靈活，一定能在日本掙到錢。於是，H 先生也在一九八八年遠赴日本，但是 H 先生只在東京附近的語言學校學習了三個月就「一身輕」<sup>88</sup>了。

H 先生很快就不滿足於打工掙來的工資了，想要做「蛇頭」賺大錢。<sup>89</sup>可惜 H 先生做蛇頭的時候，不巧剛好遇上一九八九年日本收緊留學生簽證，所以都沒有成功。

應該說也抱有投機取巧（的心態）吧，我剛剛開始的時候，開始去打工，後來也不打工了。後來我想怎麼樣，就是想做蛇頭，應該說半合法，為什麼？因為我們是通過正常的管道過去，正常到學校幫他在學校報名，報名完以後幫他去買一些保證人啊，就是幫他儘量在做那個自費留學，當時我也做了，我沒有一個人成功，沒成功我當時損失很多錢，當時在家裡舉債，差不多有欠人家六十多萬人民幣。在八幾年的時候欠人家六十幾萬，相當於現在欠人家六千多萬。那像這樣的情況下，我就又死心塌地地又去打工了。<sup>90</sup>

H 先生在日本打工的時候，充分地顯示了他的才華與過人之處。他承包過建築工，日本人要幹一個星期的活，他三天就做完了。不僅僅是因為他語言好，能夠看懂日本的建築圖紙，還是因為他能夠找到足夠多的幫手，

<sup>88</sup> 一身輕：也是在日福清人指代非法身份的說法，福清人自嘲地認為不用辦理簽證，沒有簽證的重壓反而獲得一種輕鬆。

<sup>89</sup> 福清人把當時專門辦理日本簽證的人叫做「蛇頭」。

<sup>90</sup> 引自 H 先生訪談記錄。訪談時間：2018 年 4 月 16 日。

像他一樣肯賣命地幹活。H 先生不僅幹活很會用巧思，他幫同鄉人介紹工作，從來不收介紹費，他只跟日本人談條件。

我在家裡面就朋友遍天下呀，知道嗎，那到日本也一樣啊。我呢，別人介紹朋友進來，要收介紹費，那我是一分不收的，我就是跟日本人談條件，我介紹人進來，你要加多少給我啊？這樣就不一樣了，日本人一天要給我五百塊啊，那比如說對於他，我那些朋友來講，他都非常非常感謝我，他到其他地方去，一天才八千塊，九千塊啊，到這邊來一天一萬二啊，他覺得日本人給我五百塊，是我的面子賺來的錢，而不是賺他們的錢啊。他們過來，我幫他們介紹工作，我一分錢都沒有收他們的，這些人是不是都很感激我了。<sup>91</sup>

千禧年初，當愈來愈多中國人以合法、非法身份進入日本之際，三合會及一些華人犯罪組織也在日本大舉擴張勢力。鮮為人知的是，華人幫派和日本黑道在東京、橫濱和大阪等都市都有共生關係。猶如其他 3K 行業，前者日漸把動用暴力的艱苦工作外包給華人幫派，也是看重後者能在國境之間來去自如地偷渡。<sup>92</sup>

在當時，日本的黑社會主宰著非法移民的勞務市場。在用工需求大的時候，一位日本的黑社會成員找上了 H 先生，讓他幫忙招募一批人，H 先生順利地完成了任務。於是，H 先生的名聲就在這一帶勢力中打響了，其他需要用人黑社會成員，也會打電話聯繫他。

H 先生就在打工的同時一邊積累自己的人脈，一邊留意身邊的商機。他很快就發現當時在日福清人，要往中國匯錢一般是透過日本的郵電局，不僅不方便而且收費高昂。

我們寄錢，我們應該說是為人民服務了，你就說他們去寄有幾個不方便，第一，他們今天要請假，請假一天就要去了幾千塊日元啊，第二，他們去寄錢也貴，因為他們去寄的時候，是用信封來寄，一個信封只能寄六萬塊，還要六百四十塊的手續費，那他們如果讓給我們幫他寄的話，我們才收他六百塊，便宜四十塊，第二呢，他可以不要先付錢，我們錢先到他家裡面，然後他們錢再給我們。第一是方便，第二是快速，第三是安全。為什麼，他們這些人錢寄回來的時候，都要跑到郵電局那邊去領錢，當時就有人攔在路上搶劫。那我們這樣做了以後呢，我們派幾個人先送

<sup>91</sup> 引自 H 先生訪談記錄。訪談時間：2018 年 4 月 16 日。

<sup>92</sup> Misha, Glenny：《黑道無國界》，頁 385。

到他家裡面，他打一個電話回來問一下，錢收到沒有，收到了，然後他可以利用晚上或者休息的時間，把錢存到銀行，然後給我們。<sup>93</sup>

而在日本，要透過銀行等金融機構匯款，必須要有正規的身份。於是，H 先生就從中看出了商機，他不僅認識很多日本人，還有一大幫的朋友需要這種寄錢的服務，既有資源，又有市場，於是他漸漸開始了這項特殊的服務。他把這個服務稱為「地下銀行」。「地下銀行」也稱「地下錢莊」屬於非正式經濟的一種，是從事地下經濟活動的組織。這種生意不按政府當局的法律或行政管理形式進行，即是「非法營生」。也就是社會學所稱的「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非正式經濟，又稱地下經濟、灰色經濟或影子經濟。一般指稱不被國家法律規範所認可的交易或勞務，時常被汙名化，既帶有國家中心的視野，也肯認邊境遷徙者同時與多個政體互動的事實，強調他們恆常性跨境商貿活動的自主性。<sup>94</sup>

非正式經濟代表了在國家法規束縛下的經濟中真正市場力量的入侵。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認為非正式經濟威脅到社區及整體社會的經濟穩定、社會福祉、公共衛生、公共安全及人類環境，帶來許多負面影響。<sup>95</sup>一般來說，貿易、商業或金融管制愈嚴格的國家，非正式經濟的範圍就愈廣，但也因為「非法」，警察單位有權稽查取締。<sup>96</sup>

必須指出的是，非正式經濟不受制度的保護，因此更容易發生相互的欺詐，成功運作有賴相關成員，甚至是業者與顧客間的高度信任。它具有以下屬性：1. 參與所需資金和組織的門檻較低；2. 企業為家庭所有；3. 市場的無序競爭。<sup>97</sup>

移民的地下銀行是典型的非正式經濟（圖二）。它不需要嚴密的組織結構通常由家族經營。一旦地下銀行因有利可圖而進入人們的視野，便有後繼者蜂擁而上，造成無序的競爭。H 先生也提到，自己經營地下銀行的競爭優勢之一，便是能夠得到黑社會的保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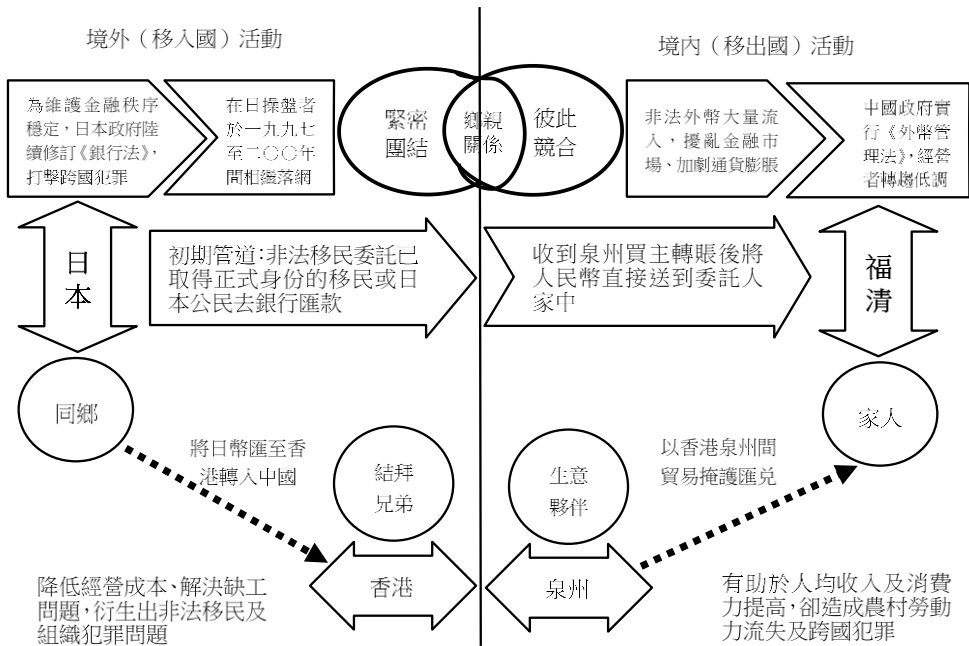
<sup>93</sup> 引自 H 先生訪談記錄。訪談時間：2018 年 4 月 16 日。

<sup>94</sup> 張雯動：〈穿越冷戰國境：中緬邊境的「地下經濟」〉，收錄於趙恩潔主編，《南方的社會/學(下)》，(臺北：左岸文化，2020 年)，頁 105。

<sup>95</sup> Louise Shelley：《暗黑經濟：不法交易如何威脅我們的未來》潘勳譯(譯)，(臺北：聯經，2023 年)，頁 29。

<sup>96</sup> 張晉芬：《勞動社會學(第三版)》，頁 67。

<sup>97</sup>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編)：《經濟社會學手冊》羅教講、張永宏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4 年)，頁 456。



【圖二】 地下銀行的跨國運作模式：赴日福清移民的非正式經濟<sup>98</sup>

地下銀行核心業務的完成，需要四地協同操作。首先，在日本的操盤人收集委託人需要匯回中國的錢款，並監督有證移民在日本銀行完成匯款手續，將錢款匯至香港的銀行帳戶。其次，香港的夥伴在銀行取出日本現鈔運到泉州的買主手中。第三，泉州的買主收到錢後，匯款至指定的中國帳戶。第四，在中國的夥伴收到錢後送往委託人家中。以上是地下銀行發展初期的典型作業流程，到後期生意成熟，現金流啟動後，採取了錢到付款的方式。地下錢莊多半是家族企業，以親族合夥經營的形式進行。因為當時 H 先生的眾多親人都同時在日本，可以幫忙收款、收集銀行帳戶等工作。而在國內的親人則幫助完成送款任務。H 先生家族的地下銀行從一九九二年開始一直經營到二〇〇四年，中間因為日本警方執法的壓制，在日本操盤者幾易其手。但始終都是 H 先生自己家裡的人。可是最終，和自己競爭生意的也是 H 先生的家裡人一他的姐姐。

經營地下銀行是非法的行為，只因當時的日本並未有專門針對此的法

<sup>98</sup>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律，所以 H 先生認為自己是在打擦邊球。並且當時日本社會的刑罰較輕，對於此類經濟犯罪的刑罰只有一年半。一九九七年 H 先生因此被抓的時候，日本方面對他的罪名認定是「非法滯留」及「非法經營」。但是到了二〇〇四年，H 先生的弟弟被日本員警抓獲時，被判違反《銀行法》及「非法滯留」。

而 H 先生的「撈偏門」<sup>99</sup>的事業不止於此。在日本，街邊時不時會出現一種電子遊戲房，裡面有很多彈珠機（日文パチンコ，平文式羅馬字 Pachinko），這種電子遊藝也曾在台灣風靡一時，玩家將小鋼珠投入機器進行遊戲，一旦中獎螢幕會顯示相應金額，累積一定鋼珠量後玩家若選擇結束遊戲，則可持機器吐出的結算卡玩換取小禮品。離開後再將這些禮品帶到遠離柏青哥店的另一處換現金。透過這種「三店方式」逃避法令，在日本，「柏青哥」產業每年營業額高達三千億美元，是汽車產業的兩倍，引發各方勢力覬覦。<sup>100</sup>由於「柏青哥」產業獲利豐厚且游離於合法與非法之間，自然吸引了很多在日本撈偏門的福清人。當時，彈子房（柏青哥店）會僱傭一些外國留學生在店中工作，福清人就漸漸熟悉了彈子房運作模式及周邊環境，也因此結識了很多經營彈子房的人。最初還只是有些人認為這裡現金多，半夜會摸進來偷錢；後來更演變成了在「柏青哥」的機械上動手腳，製作假卡來玩「柏青哥」等一系列圍繞「柏青哥」的撈偏門行為。

玩「柏青哥」可以說是日本社會的一種特殊的娛樂文化，很多旅日福清人也癡迷於這種文化，不僅一些流氓混混賺了黑錢就來放鬆一下，還有甚至一些新移民也將打工掙來的辛苦錢送入「虎口」。H 先生就認識了一位從「柏青哥」中看出「商機」的上海人 M 先生。

M 先生與 H 先生原本互不相識，M 先生是上海交大的高材生，也是 H 先生在「柏青哥」店一起打工同事的表哥。兩人在某個場合偶然相識，在一起聊天時，H 先生向 M 先生道出自己正在做地下銀行的生意，並且 M 先生也看到了桌子上的匯款單。M 先生很賞識 H 先生的生意頭腦，並透露自己的計畫意欲拉 H 先生合夥。M 先生認識上海交大幾位電子電機領域的教授，想用重金誘請教授們幫忙破解「柏青哥」機器中的密碼，這樣他們便可以製作出可以直接換取獎品的假卡，空手套白狼發大財了。只是這要先投資四萬美金，一人一半。H 先生自然是欣然答應了。

<sup>99</sup> 指做一些違法犯罪的事情並從中漁利。

<sup>100</sup> 1991 年《黑道防制法》頒布之前，日本黑幫與朝鮮商人為柏青哥的行業主體，華人幫派也從兌獎分一杯羹，三方各有地盤，皆有錢賺，彼此少有衝突。Misha, Glennly：《黑道無國界》，頁 381-382

最後，H先生的收益遠遠不止四萬美金。H先生和M先生的合作模式是前者出人，後者出卡。因為調動人力，需要由M先生提供勞務費，H先生在這裡又賺了M先生一筆。本來事先說好，要先試卡，但是H先生也都沒有試，一天至少能節省十幾萬日元的成本。於是H先生利用原先在打工階段培養起來的忠心耿耿的同鄉人脈，調兵遣將，去日本各大「柏青哥」店中去使用它們製造的假卡。因為這種假卡使用一次過後就容易被發現，於是他們騙過幾乎日本所有的「柏青哥」店之後及時地收手了。

後來，H先生的地下銀行由於接二連三地被日本員警破獲，而在經營之中，又兩次被匯款的日本人卷款而逃，H先生以及整個家族的可觀獲利，他的故事也如同許多福清人深度參與的改革開放時期「出國潮」一般，過程轟轟烈烈，卻也攔不住潮起潮落，夢醒一場空。

## 肆、分析與結論

### 一、理論分析

艱苦的打工生活是所有的赴日福清移民的必經過程，他們以「自我剝削」的方式賺取並累積金錢，當中也有眼光長遠的人，堅持完成學業、精進技能，提高自我素質與生存條件。極富創業精神的福清人不安於現狀，一旦積攢夠了本錢，便開始謀劃自己的營生。在這個階段中，福清人群體開始分化，有人與日本黑社會勾結從事違法活動；有人投機取巧，利用法律漏洞，經營地下銀行，更多數的人則是勤懇地將打工積攢下來的資本匯款贍家，一步一腳印地開創自己的事業，為何在福清人群體內會分化出截然不同的創業形式呢？其中奧妙就在於個人底蘊及其創業資本差異（表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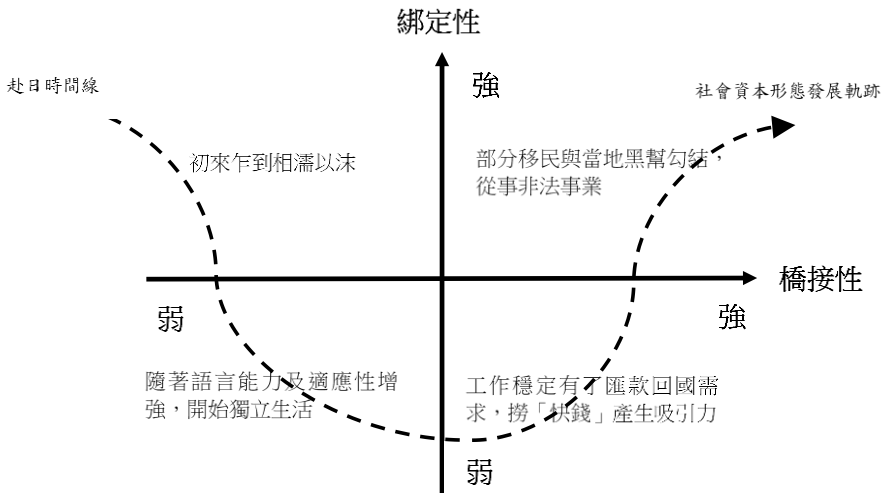
【表三】 赴日福清新移民的創業資本組合變化<sup>101</sup>

資本類型	打工初期		創業時期	
	強弱表現	說明	強弱表現	說明
社會資本	+	群體緊密地團結一起，以有濟無，互相幫助	+	福清人群體內部出現裂痕，與其他群體連結
人力資本	-	文化程度較低，不通日語	+	日語流利，適應日本社會
金融資本	-	沒有儲蓄，甚至高額負債	+	擁有一定的積蓄

<sup>101</sup>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在日福清人並未形成特定的聚居區，初來乍到時，他們多半抱團聚暖，但隨著留日時間增加，一些福清人的社會聯繫圈也會逐漸擴大，囊括了同是外國移民的中國人和韓裔日本人，這些人雖處於人際圈的邊緣地帶，卻能為福清人提供帶來利益的資訊。出於利益的合作是所有在日的「淘金者」常見的日常互動形式，在這裡，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相互作用最為強烈。

在日福清人的群體的社會資本綁定性和橋接性隨著時空環境的轉變而發生變化（圖三）。初來乍到的打工時期，福清群體的社會資本是綁定型的，基於強烈的血緣關係及地緣認同，傾向於內聚團結。在此同時，群體社會資本的黏著性能夠滿足剛來到日本，人生地不熟的福清人的生存需要。電話，作為一種當時新興的事物，成為人們用來加強黏著性的媒介。人們會抓緊一切空暇時間社交，即使在打工階段，工作時間就是金錢的情況下，人們也會在休息的時候擠出時間聚在一起。但是這種聚會是相當克制的，因為人們知道多一點時間玩耍，就少了一點賺錢的時間。如一九九〇年代末來到日本打工的 Q 女士，她只能緊緊地依靠在朋友圈裡面才能夠生存下來，但是這樣封閉又聯繫緊密的朋友圈，在一定程度上又限制了她的對外資訊的知曉，阻礙了她在日本的發展。一旦失去朋友的工作引薦，她便失去了工作。她也不能挑選適合自己的工作，只能做朋友給她介紹的工作。



【圖三】 赴日福清移民非正式經濟的社會資本類型與發展軌跡<sup>102</sup>

<sup>102</sup>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幾乎所有的訪談對象都有提到前述已及的「殺熟」的現象。在日福清人都或多或少遭受過同鄉的欺騙或傷害。這些「殺熟」或來源於妒忌心理，對於別人高收入忿忿不平，或者源於資源掠奪的物質需求。於是某些不具合法身份的福清人，由於自身的相對脆弱性難以承受社會資本帶來的負面影響，他們轉而尋求在日生活的穩定性，迴避社群、躲藏起來打工，只幫助一些較為親近的人，幾乎不與其他同鄉來往。當然，如果不想依賴社會資本生存，自身必須是有所憑恃的。如 S 先生，他自身有著一定的專業技能，日語也較為流利，他不用擔心找不到工作，因此可以完全規避同族社會資本帶來的風險。

在發展時期及其後，通常是為了經營的需要，綁定性社會資本繼續發揮作用，但是橋接性則更為重要，它帶來異質性的資源訊息，讓人們知道哪裡以及如何「有利可圖」，而社會資本的橋接性也引導著人們走向不同的道路。社團組織是橋接性社會資本的舞臺，在大阪福建同鄉會之中，X 先生找到了與自己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開創了不動產公司，原本是屬於不同群體的資源在社團組織的作用下，整合成一個群體。也有如 S 先生的個案中，群體中的成員有了一定的工作經驗和生存技能之後，為了躲避社會資本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而減少社會網路的雙向互動，將社會網路變成社會資源的單向輸出，以幫助同鄉親友找工作的形式進行。

行文至此，我們也需要意識到，對移民生存及創業而言，社會資本不盡然只有正面效應，也可能帶來負面影響。若將社會資本看成一個族裔信任系統，一方面高度綁定帶來的傷害往往更加巨大且難以逃躲，另一方面，某些邊緣行為非法勾當也因群體內的高度信任成為可能，也就是台灣俗諺所說的「打虎掠賊親兄弟」。例如 Q 女士的丈夫受到親戚的牽連被日本當局查獲，這便是社會網絡所潛藏著的負面效應。換句話說，個人人力資本和金融資本愈低，自我保護及發展事業的能力較弱時，社會資本的重要性就愈高。

總結而言，社會資本隨著福清人在日時間的增長而變化，綁定性和橋接性的強弱影響著群體資源的集中與連結，以適應不同時期發展的需要。

## 二、研究發現

社會學的研究已經指出，移民族裔聚集區的經濟型態絕非靜止不變的，它將隨著人群組成及外在環境而不斷變化。文章最後即由此跨國主義視角回應本文的研究問題及主要發現。

首先，關於不同階段的社會資本變化對赴日福清人經濟活動產生那些

影響。本研究發現，當社會資本的橋接性和綁定性同時處於高水平時，福清人既有可能團結一致發展正當事業，也可能一起抱團從事非法勾當，這取決於個人底蘊和所處群體網絡的質量。在個人層次，個人信念能否抵抗非法生意來錢多、來錢快的誘惑，這點很難從心理學角度進行行為預判，只能從結果反向推估。在群體網絡層次，必須不諱言地指出，早年赴日福清人無論在中國或日本多屬於社會底層，當時的福清新移民不具合法身份在混跡市井的情況下，接觸到夢想發大財的同鄉及日本黑社會的概率不算低，這也使得他們很容易走上越軌的道路。而投身非正式經濟事業的副作用就在於，願意鋌而走險助長犯罪行為猖獗，反過來讓不少福清人成為受害者，或是因此遭受汙名烙印，受到日本主流社會及其他中國移民的排斥。

準此，社會資本就像福清移民漂泊在外所依靠的小舟，既能夠帶他們行過茫茫大海，到達成功的彼岸，也有可能是在風雨飄搖中走向覆滅。然而，社會資本也僅只是「舟」（載體），關鍵還是看掌舵的人和所沉浮的海。

一開始小舟載著他們離開家鄉去嚮往的日本，期待闖出自己的一番天地。移民網絡吸引他們到此，也幫助他們開始新的生活。此時，福清人受益於綁定性的社會資本，產生一種僅限於我群內部的團結。但是，這也限制了資訊獲取管道及決策自由；當福清人向外拓展，必須動員其他群體的資源，這就需要仰賴橋接性社會資本。而社會資本作為創業資源，既能載舟也能覆舟，既有助於累積資本，也可能造就相互勾結越軌的非正式經濟。

其次，改革開放時期，福清赴日移民的離散經驗及生存樣態具體為何，本文已有相當完整的呈現與說明。只想再次強調，福清人赴日發展係導源於中日經濟發展程度落差、移民政策及邊界治理的牽引，反映了中日經濟需求及政治關係的晴雨。過去四十多年來，每當中日邊境控管趨嚴，或日本對勞動力的需求降低，包括福清人在內的中國移民則不免受到排擠與汙名化。為謀生計被迫鋌而走險既是事實也是銘刻在福清人身上的文化基因，相似的社會階層及遷徙經驗是福清人緊密團結，互相幫助的基礎；社會階層也間接決定了他們只能接觸到日本社會中相當有限的人群及創業機會。然而，非正式經濟與正式經濟共伴而生，以及弱勢群體因國際關係變動及經濟不均衡發展所犧牲的事實，卻也常常被打擊跨國犯罪的正義口號所掩蓋。更有甚者，在以民族國家為核心的國際遷徙框架下，部分福清人不被視為人材流出/人材流入，因為不夠「高端」，甚至根本沒被看作是「人材」，這便是將赴日福清人非正式經濟去魅化後吾人目睹的赤裸真相。也因此，在合法與非法之間徘徊，在想家與離家之間徘徊，勇往直前、愈戰愈勇，離返於中日之間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經濟謀生創富，無非是改革開放時期赴日福清人離散經驗及生存樣態的真實寫照。

## 【附件一】 受訪者資料

訪問日期	受訪者	受訪人簡要資訊
2018.03.05	Z 先生	福清市龍田鎮人，H 先生的弟弟。一九八九年某大學福清分校肄業，持東加簽證在日中轉期間非法滯留，後與哥哥共同經營地下銀行。
2018.04.15	D 先生	福清市龍田鎮人，初中畢業，原在地方供銷社有穩定工作。一九八八年前往日本，一九九七年回國。一九九七年換人頭再赴日本，二〇〇四年被親人連累，被日本員警抓獲，遣送回國。
2018.04.16	P 女士	福清人，初中畢業。一九八八年辦理留學簽證赴日打工。一九九一年回中國結婚。
2018.04.16	H 先生	福清市龍田鎮人，高中畢業，原是小學教師，後從事走私。一九八八年首次以「就學生」身份去日本，後經營地下銀行，一九九四年回國。一九九六年再偷渡日本，一九九七年因非法滯留被日本警方抓獲。
2018.04.17	S 先生	福清市龍田鎮人，高中畢業，一九八八年首次以「就學生」的身份去日本，一九九四年回國。一九九八年再次用「換船員證」的方式去日本工作，二〇〇八年回到中國。H 先生為 S 先生同學兼好友。
2018.04.18	Y 女士	福清人，原為福建某財經學院學生，大二肄業，前往日本。後透過假結婚取得日本國籍，育有兒子，小兒子為日本籍。W 為 Y 的丈夫，H 為 W 同學。
2018.04.18	W 先生	福清市龍田鎮人，福建某大學體育系畢業，後進入福州某中學任教。一九八八年前往日本打工，後因販賣假電話卡被抓獲，遣送回國。二〇〇三年，透過大學推薦信取得日本簽證，入海關時，因有案底不成。Y 女士是 W 先生的妻子。
2018.04.23	L 先生	福清市龍田鎮人，高中畢業，退伍軍人。一九八八年申請留學簽證赴日，打工不果，開始製造假簽證，偽造文書和偽造身份證件等生意。一九九一年被日本員警抓獲遣送回國。D 先生是 L 先生的好友。
2018.04.24	Q 女士	福清市龍田鎮人，初中畢業，D 先生的妻子。一九九八年「換人頭」（改變身份），與丈夫共同赴日打工，後因意外被員警發現遣送回國。
2018.04.24	C 先生	福清龍田人，一九八八年辦理留學簽證赴日打工。一九九七年歸國後，又辦理工作簽證往日本，後經營日本往中國、東南亞的生意。
2018.05.24	X 先生	一九九三年福建某大學教育系畢業，並擔任了一年中學體育教師，一九九四年考上日本大學，二〇〇〇年就職與豐田精工的下屬公司，二〇一五年集資創建不動產公司（株）某某商事擔任副社長。
2018.05.24	R 先生	一九八八年到日本，與日本籍女子結婚後，在日本開飯店，並利用此機會當「蛇頭」。後來，因其擁有正規身份，也幫助地下銀行匯錢，後經營中日貿易。此訪談為電話採訪。
2018.05.26	J 先生	曾在僑務相關部門工作五年，二〇〇〇年來到日本，二〇〇三至二〇〇七在印尼從事貿易，二〇〇九年加入日本國籍，同年成立國際貿易公司，從事通關業、物流相關服務。
2018.05.26	L 女士	一九九一年自中國南方某大學中文系專科畢業，二〇〇〇年跟隨丈夫去日本留學。在日本育有兒子，在日獨自撫育三子，期間打工補貼家用，直到丈夫決定創業，才決定和丈夫一起打拼。

## 引用書目

### 近人文獻

大衛·哈爾朋 DAVID, Halpern

2008 《社會資本》，黃克先、黃惠茹（譯）（臺北：巨流，2008年）。

“Social Capital”, translated by Huang Kexian & Huang Hurui (Taipei: Chu Liu, 2008).

中共福清市委黨史研究室（編） Party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of CPC Fuqing Municipal Committee (Eds.)

2011 《福清華僑史》，（福州：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History of Fuqing Overseas Chinese” (Fuzhou: China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 2011).

毛立平 MAO, Liping

2002 《闖蕩日本：一個福清人眼中的日本》，（福州：海潮攝影藝術，2002年）。

“Make A Living and Wandering in Japan: Japan through the Eyes of a Fuqing Immigrant” (Fuzhou: Tide Photography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2).

王付兵 WANG, Fubing

2016 〈福州沿海地區新移民問題初探〉，《閩江學院學報》，第37卷第3期（2016年9月），頁7-19。

“Studies in the Problem of New Emigrants from Coastal Areas of Fuzhou”, Journal of Minjiang University, Vol. 37, No. 3 (September, 2016), pp. 7-19.

王春光 WANG, Chunguang

2000 〈流動中的社會網路：溫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動方式〉，《社會學研究》，2000年第3期（2000年9月），頁109-123。

“Social Network in flow: Flow: Lifeway of Wenzhou Immigrant in Paris and Beijing”, Sociological Studies, Issue 3 (September, 2000), pp. 109-123.

加里·貝克爾、戴安娜·科伊爾 GARY S. Becker & DIANE, Coyle

2017 《移民的挑戰——一個經濟學的視角》，徐春華（譯）（北京：

新華書店，2017年）。

“The Challenge of Immigration: A Radical Solution” translated by Xu Chunhua (Beijing: Xinhua Bookstore, 2017)

尼爾·斯梅爾瑟、理查·斯威德柏格主編 NEIL J. Smelser & RICHARD Swedberg

2014 《經濟社會學手冊》，羅教講、張永宏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4年）。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translated by Luo Jiaojiao, Zhang Yonghong et al.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14).

米夏·葛列尼 MISHA, Glenn

2009 《黑道無國界》，林添貴（譯），（臺北：時報文化，2009年）。

“McMafia: Crime Without Frontiers” translated by Lin Tianguai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2009).

何思慎 HO, Szu-shen

2004 〈台灣之日本研究的困境與改善〉，《亞太研究論壇》，第26期（2004年12月），頁82-93。

“Difficulties and the Remedies for Japan Studies in Taiwan”, Asia-Pacific Research Forum, Issue 26(2004), pp. 82-93.

何燕 HE, Yan

2018 〈改革開放以來福清籍旅日華僑華人與僑鄉社會研究〉（華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碩士論文，2018年）。

“Research of Fuqing Immigrants in Japan and their Hometown Development during China Reform and Opening up”, (Master Thesis of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uaqiao University, 2018).

李明歡 LI, Ming Huan

2005 〈「僑鄉社會資本」解讀：以當代福建跨境移民潮為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2005年6月），頁38-49。

“Understanding Qiaoxiang Social Capital: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Migration Wave in Fujian Province”,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ssue 2 (June, 2005), pp. 38-49.

李明歡 LI, Ming Huan

2002 〈群體效應、社會資本與跨國網路—歐華聯會的運作與功能〉，《社會學研究》2002年第2期（2002年6月），頁30-39。

Collectivity, Social Capital and Transnational Networks: Operations and Functions of European Federation of Chinese Organizations (EFCO), Sociological Studies, Issue 2 (June, 2002), pp. 30-39.

沈燕清 SHEN, Yanqing

2012 〈福清新移民與僑鄉地下錢莊關係探析〉，《八桂僑刊》，2012年第2期（2012年6月），頁57-62。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qing New Immigrants and Illegal Private Bank in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s”, Overseas Chinese Journal of Bagui, Issue 2 (June, 2012), pp. 57-62.

周敏、林閩鋼 ZHOU Min & LIN, Mingang

2004 〈族裔資本與美國華人移民社區的轉型〉，《社會學研究》，2004年第3期（2004年9月），頁36-46。

“Ethnic Capita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ological Studies, Issue 3 (September, 2004), pp. 36-46.

周敏主編 ZHOU, Min (Ed.)

2021 《長為異鄉客？—當代華人新移民》，（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21年）。

“Forever Strangers? Contemporary Chinese Immigrants Around the World”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2021).

孟慶梓 MENG, Qingzi

2007 〈海外新移民與當代鄉村經濟變遷—以福建省福清市J村為個案的實證研究〉，《南方人口》，2007年第4期（2007年12月），頁39-44。

“New Overseas Migrants and Economic Changes of Rural Areas: An Empirical Study of J Village in Fuqing City of Fujian Province”, South China Population, Issue 4 (December, 2007), pp.

93-44.

孟慶梓 MENG, Qingzi

2008 〈海外新移民與當代農村文化變遷—基於福建沿海J村的調查分析〉，《南方人口》，2008年第1期（2008年3月），頁18-24。

“New Oversea Emigrants and Its Impacts on the Cultural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Rural Areas: A Case Analysis of J Village in Fujian Province”, *South China Population*, Issue 1 (March, 2008), pp. 18-24.

林心滄 LIN, Xingan

2013 〈改革開放以來華僑華人在福清僑鄉捐贈行為的文化解讀〉，《八桂僑刊》，2013年第4期（2013年12月），頁15-21。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Donation behavior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Hometown of Fuqing dur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verseas Chinese Journal of Bagui*, Issue 4 (December, 2013), pp. 15-21.

林志斌、張立新 LIN, Zhibin & ZHANG, Lixin

2008 《打工者參與式行動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on Migrant Workers”,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08).

林季平 LIN, Jin-Ping

2005 〈台灣的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問題回顧：1980-2000〉，《台灣社會學刊》第34期（2005年6月），頁147-209。

“A Critical Review of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Population and Labor Migration in Taiwan, 1980-2000”,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Issue 34 (June, 2005), pp. 147-209.

林桶法 LIN, Tongfa

2014 〈口述歷史的特性與作用〉，收錄於許雪姬主編，《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臺北：臺灣口述歷史學會，2014年），頁19-36。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Oral History”, In XU Xueji Ed. *Theoretical Practice and Cases of Taiwan Oral History* (Taipei: Taiwan Oral History Society, 2014). pp. 19-36.

邵春芬 SHAO, Chunfen

2021 〈日本的中國新移民〉，收錄於周敏主編，《長為異鄉客？—當代華人新移民》，（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21年），頁 65-94。

“China New Immigrants in Japan”, In Zhou Min Ed. “Forever Strangers? Contemporary Chinese Immigrants Around the World”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2021), pp. 65-94.

施雪琴 SHI, Xueqin

2000 〈改革開放以來福清僑鄉的新移民—兼談非法移民問題〉，《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0年第4期（2000年12月），頁 26-31。

“New Immigrants from the Hometow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Fuqing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Discussing the Issue of Illegal Immigration”, Journal of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ssue 4 (December, 2000), pp. 26-31.

唐諾·李奇 DONALD, A. Ritchie

1997 《大家來做口述歷史》，王芝芝（譯）（臺北：遠流，1997年）。

“Doing Oral History” translated by Wang Zhizhi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1997).

馬克·格蘭諾維特、理查·斯威德伯格編著 MARK, Granovetter & RICHARD, Swedberg (Eds.)

2014 《經濟生活中的社會學》，瞿鐵鵬、姜志輝（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translated by Ju Tiepeng & Jiang Zhihu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14).

高偉濃等著 GAO, Weinong et al

2003 《國際移民環境下的中國新移民》，（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3年）。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Environment” (Beijing: The Chinese Overseas Publishing House, 2003).

張晉芬 CHANG, Chin-fen

2023 《勞動社會學（第三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2023年）。

“Sociology of Labor (3<sup>rd</sup> edition)” (Taipei: Chengchi University Press, 2023).

張雯勤 CHANG, Wen-Chin

2020 〈穿越冷戰國境：中緬邊境的「地下經濟」〉，收錄於趙恩潔主編，《南方的社會/學（下）》，（臺北：左岸文化，2020年），頁99-128。

“Crossing Cold War Borders: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on the China-Myanmar Border” in CHAO Enjie Ed. Studying the South. the South, Studying (Taipei: Rive Gauche Publishing House, 2020), pp. 99-128.

莊國土 ZHUANG, Guotu

2018 《世界華僑華人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World”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2018).

郭玉聰、莊國土 GUO Yucong & ZHUANG, Guotu

2008 〈福州赴日新移民的增長態勢及其主要原因——以福清市為例〉，《南洋問題研究》，2008年第2期（2008年6月），頁52-62。

“Growth Pattern of the New Emigrants from Fuzhou to Japan and the Main Reasons for It: Taking Fuqing as a Case”,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Issue 2 (June, 2008), pp. 52-56.

郭玉聰 GUO Yucong

2009 〈福建省國際移民的移民網路探析——兼評移民網路理論〉，《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2009年12月），頁113-120。

“Networks for International Emigr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and the Migration Network Theory”,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 (A Bimonthly for Studies in Arts & Social Sciences) Issue 6 (December, 2009), pp. 113-120.

陳國貴、張其娥 CHAN, Kwok-Bun & CHIANG, Claire See Ngoh

1996 《出路——新加坡華裔企業家的成長》，王業龍（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Stepping Out: The Making of Singapore Chinese Entrepreneurs”  
translated by WANG, Yelo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1996).

陳國貴、陳慧雲 CHAN, Kwok-Bun & CHEN, Huiyun

2007 《中港徘徊：香港流動巡迴企業家的故事》，（香港：中華書局，2007年）。

“Wandering in China and Hong Kong: The story of Hong Kong Itinerant Entrepreneurs” (Hong Kong: Chung Hwa Book Co, 2007).

陳國貴 CHAN, Kwok-Bun

2010 《華商：族裔資源與商業謀略》，（香港：中華書局，2010年）。

“Chinese Businessmen: Ethnic Resources and Business Strategies” (Hong Kong: Chung Hwa Book Co, 2010).

陳琮淵 CHEN, Tsung-Yuan

2016 〈海外福州人的社會資本與創業發展—馬來西亞個案探析〉，  
《閩江學院學報》，第37卷第3期（2016年9月），頁20-26。

“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Foochow Communities—Cases from Malaysia” Journal of Minjiang University Vol. 37 No. 3 (September, 2016), pp. 20-26.

陳鴻星、邵東、張步忠 CHEN, Hongxing, SHAO, Dong & ZHANG, Buzhong

2004 〈福清判罰一特大「地下錢莊」11人被判刑罰金〉，《中國新聞網》，2004年5月15日，  
<https://www.chinanews.com.cn/news/2004year/2004-05-15/26/436776.shtml>。

“Fuqing Fines 11 People from a Large Illegal Bank” China News, May 15, 2004.  
<https://www.chinanews.com.cn/news/2004year/2004-05-15/26/436776.shtml>

涂炯 TU, Jiong

2015 〈多點民族志：全球化時代的人類學研究方法〉，《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12月2日。

“Multi-sited Ethnography: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hinese Social Science Today, December, 2, 2015.

新華網 Xinhua News

2023 〈海外華人黑幫真已牛遍全球？媒體缺乏瞭解捕風捉影〉，  
《中國新聞網》，2010年8月16日，  
<https://www.chinanews.com.cn/hr/2010/08-16/2468933.shtml>。

“Dose Overseas Chinese Mafias Really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Media Lacks Understanding and Catches the Wind” China News,  
August, 16, 2010. <https://www.chinanews.com.cn/hr/2010/08-16/2468933.shtml>

楊興雲 YANG, Xingyun

2007 〈福清樣本：兩輪移民潮的典型烙印〉，《經濟觀察網》，  
2007年8月9日，  
<https://www.eeo.com.cn/2007/0809/79353.shtml>。

“Fuqing Sample: Typical Imprint of Two Waves of Immigration”  
The Economic Observer, August, 9, 2007.  
<https://www.eeo.com.cn/2007/0809/79353.shtml>

路意絲·雪萊 LOUISE, Shelley

2023 《暗黑經濟：不法交易如何威脅我們的未來》，潘勛（譯）  
（臺北：聯經，2023年）。

“Dark Commerce: How a New Illicit Economy Is Threatening Our  
Future” translated by Pan Xun (Taipei: Linking, 2023)

廖赤陽等 LIAO, Chiyang et al

2015 《跨越疆界：留學生與新華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Transiting Boundaries: Chinese Students and New Migrants in  
Japa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5).

福建統計局 Fujian Province Statistics Bureau

1999 《福建統計年鑒（1999）》（福州：福建統計局，1999年），  
<http://tjj.fujian.gov.cn/tongjiniannian/dz99/index1.htm>。

“Fujian Statistical Yearbook 1999” (Fuzhou: Fujian Province  
Statistics Bureau, 1999).

福清市志編纂委員會 Editorial Committee of Fuqing City Chronicle

1994 《福清市志》，（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年）。

1994 “Fuqing City Chronicle”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1994).

劉雙 LIU-FARRER, Gracia

2016 《從打工者到跨國人才：當代中國人赴日留學30年》，（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

“From Migrant Labor to Transnational Talent: Thirty Years of Student Migration from China to Japan”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2016).

蔡昉 CAI, Fang

2006 〈中國轉軌時期的勞動力流動〉，收錄於羅紅波主編，《移民與全球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頁129-145。

“Labor Mobility during China's Transition Period” In LUO Hongpo Ed. Immig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06), 129-145.

鄭也夫 ZHENG, Yefu

2001 〈走向殺熟之路—對一種反傳統歷史過程的社會學分析〉，《學術界》，2001年第1期（2001年3月），頁58-76。

“Come to Way of Swindling Acquaintances: Social Analysis on a Kind of Anti-Traditional Historical Course” Academics Issue 1 (March, 2001), pp. 58-76.

鄭樂靜 ZHENG, Lejing

2017 《溫州人在日本：溫籍華人華僑口述歷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

“Wenzhou People in Japan: Oral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from Wenzhou”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盧倩儀 LU, Chien-Yi

2006 〈政治學與移民理論〉，《台灣政治學刊》第10卷第2期（2006年12月），頁209-261。

“The Disciplin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ories of Migration”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 No. 2 (December, 2006), pp. 209-261.

應星 YING, Xing

2006 〈略論敘事在中國社會研究中的運用及其限制〉，《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2006年9月），頁71-75。

“Application of Narration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Limit” *Journal of Jiang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Issue 3 (September, 2006)

〔日〕中川雅貴 NAKAGAWA, Masaki

2019 〈外国人人口の分布と移動〉，收錄於小崎敏男、佐藤龍三郎編著，《移民・外国人と日本社会》，（東京：原書房，2019年），頁57-80。

“Distribution and Movement of Foreign Population” In OZAKI, Toshio & SATO Ryuzaburo Eds. *Immigration, Foreigners and Japanese society* (Tokyo: Hara Shobo, 2019), pp. 57-80.

〔日〕加藤丈太郎 KATO, Jotaro

2022 《日本の「非正規移民」：「不法性」はいかにつくられ、維持されるか》，（東京都：明石書店，2022年）。

“Japan's “Irregular Immigrants”: How is “illegality” Created and Maintained?” (Tokyo: Akashi Bookstore, 2022).

〔日〕陳於華 CHEN, Yuhua

2004 〈増大する新来中国人のコミュニティ〉，收錄於庄司博史編著：《多みんぞくニホン：在日外国人のくらし》，（吹田：千里文化財団，2004年），頁87-89。

“A Growing Community of New Chinese” In SHOJI, Hiroshi Ed. *Taminzoku Nihon: Life of Foreigners Living in Japan* (Suita: The Senri Foundation, 2004), pp. 87-89.

ALEJANDRO, Portes

2010 *Economic Sociology: A Systematic Inqui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ALEJANDRO, Portes, & SENSENBRENNER, Julia

1993 “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 Notes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8, No.6 (1993), pp. 1320-1350.

ASIS, Maruja, M. B., & PIPER, Nicola



2008 Researching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in Asia.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49, No. 3 (2008): pp. 423-444.

BORÄNG, Frida

2018 National Institutions -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Labour Markets, Welfare States and Immigration Policy.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Ltd, 2018).

BURT, Ronald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COE, Neil, M., KELLY Philip F., & YEUNG, Henry W. C.

2013 *Economic Geography: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13).

COLEMAN, David

2006 Immigration and Ethnic Change in Low-Fertility Countries: A Thir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2, No. 3 (September 2006), pp401-446.

GLICK, Schiller N., BASCH, Linda, & BLANC-SZANTON, Cristina

1992 Transnationalism: A New Analytic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Migration.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645, No.1 (July 1992), pp. 1-24.

JEAN-PIERRE, Cling, Stéphane, LAGRÉE, RAZAFINDRAKOTO, Mireille and ROUBAUD, François, eds.

2015 *The Informal Econom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Routledge, 2015).

LEITNER, Helga

200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In Eric Sheppard, Trevor J. Barnes. (eds). 2003. *A Companion to Economic Geography*.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Pp. 450-467.

LEVITT, Peggy & GLICK, Schiller N.,

1992 Conceptualizing Simultaneity: A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 Perspective on Socie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38, No.3(1992): 1002-1039.

LIU-FARRER, Gracia

2008 The Burden of Social capital: Visa Overstaying among Fujian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 Vol. 11,

No.2 (December, 2008), pp. 241-257.

MASSEY, Douglas, S., ARANGO Joaquin, HUGO Graeme, KOUAOUICI Ali, PELLEGRINO Adela, & TAYLOR Edward J.

1993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9, No. 3 (September, 1993), pp. 431-466.

MASSEY, Douglas, S., ARANGO Joaquin, HUGO Graeme, KOUAOUICI Ali, PELLEGRINO Adela, & TAYLOR Edward J.

1998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UTNAM, Robert

1995 Turning in, Tur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28, No.4 (1995), pp. 664-665.

SAMERS, Michael & COLLYER, Michael

2017 *Migration*.2nd (London: Routledge, 2017).

SASSEN, Saskia

2000 *Guests and Aliens* (New York: New Press, 2000).

THUNØ, Mette & PIEKE, Frank N.

2005 Institutionalizing Recent Rural Emigration from China to Europe: New Transnational Villages in Fuji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9, No. 2 (Summer, 2005), pp. 485-514.

VERTOVEC, Steven

1997 Three Meanings of "Diaspora," Exemplified among South Asian Religions.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Vol. 6, No.3 (Winter, 1997), pp. 277-299.